

存平文史資料

第二輯



25/10/52

91



上海圖書館藏

在平文史资料

第二辑



政协在平县文史委员会

前 言

李盛奎

我们伟大的祖国历史悠久，有着光辉灿烂的古代文化遗存。在平县自秦置县距今已有两千二百余年的历史，那么在平置县前经济文化的发展状况如何呢？关于这方面的情况，长期以来，既不见经、传，又没考古发掘报告，成了个谜。因此，直到本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出版公布的我国古代文化分布图，在在平这块土地上仍然是个“空白”。对之所以是“空白”区的解释，当时的许多历史学家和考古工作者比较一致的看法是：在平正处黄河中下游冲积平原，由于历史上黄河多次决口，众多古文化遗存被深埋于地下，不见天日，难被发现。

一九五六年，我县文化部门组织专门人员进行第一次文物普查，这次普查除收集到部分社会流散文物和近代革命文物外，对古代文化遗存没能有所发现。尔后，在县政府机关院内，距地表三米多深的淤沙层内发现了宋、元瓷罐，在四新河清淤中发现了埋于淤泥中的明代碑刻，都证明了上述看法的正确性和权威性。

直到一九七三年，全国进行第二次文物普查，我县文物普查小组，在茌平镇尚庄村首次发现大汶口、龙山文化遗存时，认为茌平是一片“空白”的传统看法始被打破。尚庄大汶口中后期文化遗存的发现，使大汶口文化的分布，由原来的黄河以南扩大到黄河以北。尤其尚庄龙山文化遗存的发现，使我国龙山文化出现了新的类型——既区别于河南龙山文化，又不完全同于山东龙山文化的尚庄龙山文化新类型。这一新发现引起考古学界高度重视，当时香港报界给予报导，国家也把这一发现列入建国以来的考古新收获。从一九七五年开始，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及省博物馆、山东大学等单位，多次组织考古工作者对我县陆续发现的一批原始社会末期的村落遗址、古墓葬群进行了比较深入的调查，并先后对尚庄、南陈、教场铺、李孝堂、台子高等遗址进行了试掘，都取得了可喜的成果。

通过数次文物普查、考古发掘，大批遗物、遗迹的被发现，用第一手实物资料证实了早在四五千年前，我们的祖先就用丰富的智慧、勤劳的双手，在茌平这块古老的土地上，创造着丰富多彩、光辉灿烂的古代文明。而这期间，也正是我国古代历史上原始社会末期，商品、货币交换、家庭、私有制、国家开始起源的重大历史变革时

期。同时，由于尚庄龙山文化的发现，又证实茌平这个地方，还是我国历史上夏朝之前，东夷部落、华夏部落经济文化交流的结合部位。因此，对研究我国原始社会末期的历史，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古文化一直发挥着巨大作用，甚至在现代文化中仍占有一定的重要地位。通过对古遗址的发掘，我们试图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去认识和阐明人类社会的面貌和历史发展规律，帮助人们认识自己的历史和创造力量，从而提高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而我们编写这辑我县文物资料，就是为了激发我县人民热爱祖国、热爱家乡故土的思想感情，继承中华民族宝贵的文化遗产，发扬我们祖先勇敢、勤劳、艰苦创业的精神，提高我县人民的文化素质和道德水平，在四化建设中发挥积极作用，把我们的祖国，我们的家乡建设得更加美好，更加富强。

在平县文史资料

第三辑

(内部资料注意保存)

政协在平县委员会文史科编

一九九一年五月

目 录

前言

李盛奎

古代遗址

- 在平县遗址分布图.....马允华
在平尚庄新石器时代遗址.....选 录 (1)
在平县南陈庄遗址.....选 录 (21)
在平县遗址调查登记表.....马允华

古代墓葬

- 王曰高墓及墓志铭.....文史科 (40)
韩国玺墓....." " (44)
张后觉墓....." " (47)
石勒墓....." " (50)

马定国墓	文史科	(52)
耿端义墓	" "	(54)
马周墓	" "	(56)
鲁仲连墓	" "	(60)
淳于髡墓	" "	(64)

古代石刻

在平县广平出土的唐代石造像	刘善沂	(67)
《孔子回轅处》石碑	文史科	(69)
北王桥家庙石刻	" "	(72)
迟桥“节孝”碑	" "	(74)
冯公碑记	" "	(75)
净居寺碑	" "	(76)
董立元碑	" "	(77)
冯玉祥题字碑	" "	(80)
在平县碑碣统计表(一)、(二)	" "	

古代窖藏

在平县发现一处元代窖藏	选登	(83)
在平县郝屯出土一批金元器物	" "	(87)

革命文物

抗日英雄村张家楼	地名办	(92)
“六·二七”惨案纪念碑	" "	(94)

“孟尝君”抗战烈士纪念碑	地名办	(97)
赵洪光革命烈士纪念碑	“ ”	(99)
太平桥与万人坑	文史科	(101)
义和拳与五里庄	“ ”	(103)

在博景观

在平八景	“ ”	(105)
博平八景	“ ”	(116)

历史觅踪

唐 槐	“ ”	(125)
明代石桥	“ ”	(127)
故土洪洞县	选 登	(129)
在平衙门朝正东	“ ”	(132)

在平县村庄命名与通名用字浅释 马传文 (135)

民间艺术奇葩

在平县董庄民间中堂画
.....	路振华、孙立杰 (146)

附：在平政协文史资料征集提纲

后 记

编 者

茌平尚庄新石器时代遗址

尚庄村位于山东省茌平县城西二公里处，北距翟庄0.5公里，地势平坦，属于黄河冲积平原。遗址座落在尚庄村东的一块隆起的土岗上。土岗中心高出周围地面约三米，当地群众称之为岗子。清代康熙年间重修の《茌平县志》云：“尖塔岗在城西二里”，就是指的这块高地。

一九七五年春，尚庄大队社员在挖沙中发现该遗址，同年秋季，由省和部分地、县文物工作者组成发掘工作组，在聊城地区文化局和茌平县文教局的大力支持下，进行第一次发掘。发掘坑位采用象限法，即在遗址中心最高处选一基点，把遗址划分为四个区。这次在Ⅰ区东部发掘探方一个，在Ⅱ区西部发掘探方二十九个，Ⅲ区东北角遗址最高处发掘探方一个。翌年春季又进行第二次发掘，在Ⅱ区西部发掘探方十个，在Ⅳ区南部发掘探方五个。探方均为5×5平方米，南北正方向，两次发掘面积共1125平方米。先后参加发掘工作的省、地、县文物干部有张其海、王恩田、吴文棋、吴诗池、赵春生、常叙政、孙立科、李盛奎、刘国栋、贺忠祥、张冠之、魏法

贤、张思增、朱允功、李灿章、王宗涛、张作义、刘维仁、王景武、李东山等同志。袁明、苏玉琼、叶健等同志参加资料整理工作。由韩树鸣、王占琴同志绘图，冀介良同志摄影，纹饰由王玉美同志拓墨。

这两次发掘共发现大汶口文化墓葬十七座；龙山文化灰坑一三九三个，灰沟一条，房址一座；商代灰坑一个；西周灰坑三个，墓葬四座；春秋墓葬两座；汉代砖室墓两座。不明时代的墓葬四座。本文主要报导大汶口文化和龙山文化的遗存。

一、地层堆积

遗址东西长约300米、南北宽约250米，总面积达75000平方米左右。遗址的中心部分，文化层堆积较厚，除大汶口文化层和龙山文化层外，还有西周文化层、汉代文化层和近代扰乱层。其他部分，文化层的分布和堆积厚薄也不同，以大汶口文化层和龙山文化层分布范围最广，西周、汉文化层则断续分布。因此，有的地方耕土下即为龙山文化层或灰坑。现以Ⅲ区T1、T310、Ⅳ区T1109地层堆积为例，说明如下。

(一) Ⅲ区T1西壁地层堆积情况

第1层：可分为二小层，1A层为耕土层，黄灰色土，厚0.1—0.2米；1B层为近代扰乱层，褐色土，土质疏松，厚0.5—0.62米，出

土近代陶、瓷残片等。

第2层：汉代层。深灰色土，土质松软，厚0.7——0.8米。地层中夹有夯土，夯窝径4——6厘米。出土有汉代砖瓦和陶罐、盆等残片。

第3层：西周层。黄花土，土质松软，厚0.15——0.25米。出土有陶豆、盆、罐等残片。发现墓葬四座，随葬器物有陶豆、罐、盆和骨簪等。

第4层：仅有4B层，系龙山文化层。黄褐色土，土质较硬，夹杂少量炭屑和红烧土碎块，厚0.2——0.3米。发现灰坑五个，出土有陶盆、罐、鬲、碗等。

此方无第5层。

第6层：大汶口文化层。红褐色土，土质坚硬而纯净，厚0.55——0.6米，无出土物。

(二) Ⅱ区T310的西壁地层堆积情况

第1层：耕土层，厚0.1——0.25米。

第2层：汉代层。深灰色土，土质松软，厚0.05——0.15米。出土遗物同ⅡT1第2层。

此方无第3层。

第4层：龙山文化层。可分为两小层：4A层为灰黄色土，土质略松，厚0.23——0.5米。出土有罐、盆、算（音陞）、器盖和鸟头形鼎足、袋状鬲（音规）足、鬲（音眼）足以及兽、

畜骨、蚌壳等。4 B层为黄褐色，土质稍硬、夹杂少量炭屑和红烧土碎块，厚0.4——0.55米，发现灰坑五个，出土遗物有罐、盆、器盖、杯和鬲裆、鬻鬲（音判）等。

此方无第5层。

第6层：大汶口文化层。红褐色土，土质较坚硬，纯净，厚0.3——0.49米。陶片极少，为饰篮纹的夹粗砂灰陶厚缸片。

（三）IV区南坡的T1109北壁地层堆积情况

第1层：耕土层，厚0.1——0.27米。

第2层：汉代层。深灰色土，土质疏松，厚0.1——0.2米。出土文物同Ⅲ区T1第2层。

此方无第3层。

第4层：龙山文化层。可分为二小层：4 A层，灰黄色土，土质略松，厚0.15——0.5米，发现灰坑二个，出土有鸟头形足鼎、倒三角形足鼎，袋足鬻和鬲、罐、盆、算、器、盖等。4 B层，黄褐色土，坚硬，夹杂炭屑和红烧土碎块，厚0.5——1米，发现灰坑六个。出土遗物与ⅢT310第4 B层相同。

第5层：大汶口文化层。灰褐色土，土质很硬，纯净，厚0.07——0.70米。出土极少量的夹粗砂红陶厚缸片。

第6层：大汶口文化层。红褐色土，土质坚

硬，纯净，厚0.2——0.7米。无出土物。

根据地层和遗迹的打破关系，对出土遗物的排比和分析，将尚庄新石器时代遗存分为三期。第5、6层和第5层下的墓葬为第一期文化，第4层和其下层的灰坑为第二期文化，第3层或耕土下开口的灰坑、灰沟、房址为第三期文化。第一期属大汶口文化，第二、三期属山东龙山文化。

二、大汶口文化的墓葬和遗物

（一） 墓葬

墓葬都集中在遗址西坡Ⅲ区内的大汶口文化层下，共十七座。这些墓葬均开口在第5层，并打破第6层。

墓葬皆为长方形土坑竖穴，四壁齐整，一般墓口略大于底部，头端稍宽，脚端稍窄。墓坑一般长1.5——2.5、宽0.55——1.5、深0.55米左右。其中，在四座有熟土二层台的墓葬中，有三座墓有原始木椁，椁室一般仅能容纳一具尸体，熟土二层台和填土多呈灰褐色。余墓无葬具。这批墓葬中，五座为二次葬，头向不明，其余均头东脚西，方向多在 80° —— 98° 之间。除一座为双人墓（一成年女姓，一小孩）仰身直肢葬外，其余皆为单人仰身直肢葬。

随葬器物不丰富，三座墓无随葬品；随葬器

物不超过八件的九座；随葬十二至二十二件器物的五座，规模都较大，有的有二层台和葬具。随葬器物主要是陶质生活用具，其次是石器、骨器和蚌器等，还有少量的装饰品和獐牙，M25有一件龟甲。多数墓葬的陶器置于人骨架下肢的左侧和脚下，少数置于头部的顶端或两侧。生产工具多放置在腰间或手臂外侧。石镯戴于手腕以上，獐牙放于手掌。现举两例说明。

M23号 墓口距地表深1米，墓坑长2.64、宽1.1米。有熟土二层台，台高0.43、宽0.2米。棺室长2.24、宽0.65、高0.62米，方向93°。单人仰身直肢葬，有炭化木棺盖痕迹。随葬器物十三件，罐、壶、碗、杯、勺等陶器置于棺室内西南角，石铲涂朱，置于盆骨右侧；牙梳、束发器放在头部，绿松石饰放在左肱骨外侧，獐牙放在近手掌处。左右肱骨及其附近皆遗有朱红颜色。

M26 墓口距地表深0.95米，墓坑长2.38、宽0.97——1.10、残深0.24米。女姓，约35岁，仰身直肢，方向88°。随葬品八件，陶罐置于右脚部，左右肩上侧各放一陶杯，右桡骨外侧置一高足杯，左手腕外侧有尊形器，手臂上套石镯。

（二） 遗物

大汶口文化遗物除个别器物为地层出土和采集外，余均为墓葬的随葬品，共有102件。主要

是陶质生活用具，其次为生产工具和装饰品。

1、 陶器

五十九件（其中采集四件，地层出土一件），复原四十八件。陶质分为泥质、夹粗砂和夹细砂陶三类。泥质陶数量最多，占总数的82.9%，主要有鼎、罐、壶、杯、高足杯、碗、尊、尊形器、鬲、盂（音禾）背壶、觚（音骨）钵、勺、缸等，个别的器物，陶质非常细腻，如薄胎筒形单耳杯和彩陶钵等。夹粗砂陶约占7.6%，屨（音揆）和砂粒较粗，器形有缸、鼎。夹细砂陶占9.5%，器形主要有鬲、罐和背壶。

陶色可分为灰、青灰、红、褐红、橙红、灰褐、白等七种，以灰陶居多，约占40%，青灰陶占29.1%，红陶占19.2%，褐红陶占5.7%，其他三种，各占1.9%。

陶器烧制火候一般较高，质地坚硬。仅少量器物的火候较低，胎质松软，如褐色红陶鬲、灰陶尊形器等。陶器全部手制，一般采用泥条盘筑法，有的器物内壁尚留有未完全抹平的泥条盘筑痕迹，如厚胎大缸。有的小明器是捏塑而成，如小杯和小鼎。器物外表除大缸外，皆经工具压磨，器表面紧密平整，多数器表都经磨光，个别器物施一层红陶衣。

陶器47.8%为素面，常见的纹饰有附加堆

纹、篮纹、弦纹、锥刺纹和镂孔等。附加堆纹多见于罐、壶的腹部，篮纹较粗，见于缸罐的腹部，弦纹施于缸腹，镂孔施于高足杯，而锥刺纹仅用于鼎的折腹处。此外，还有彩陶和彩绘。彩陶赭、黑、红、白色并用，纹饰有带状、眼球状、网状等等几何图案，线条流畅、色泽鲜艳，见于壶、钵；彩绘则用朱红和黄色，仅施于杯。

现将部分陶器介绍如下。

鼎：泥质红陶，小口微侈，高颈，鼓腹，小平底，根部外突的矮凿形足。高13、口径5.6厘米。

鬲：细砂灰陶、短流、矮颈，扁园腹，平底，扁凿形足根部外突，泥条状把手。颈部一周齿状堆纹。高21.2厘米。

罐：泥质红陶，外施红陶衣。侈口，束颈，球腹，底残。肩饰对称小竖鼻。残高13、口径8.5厘米。

壶：泥质灰陶。园唇，侈口，高颈，扁园腹，平底。高18.5、口径9.5厘米。

杯：泥质灰陶、侈口，筒状腹，微凹底，矮园足，高12、口径10厘米。

觚：泥质灰陶，全器呈长喇叭形，平底。高21.5、口径9.8厘米。

钵：直口、直腹，下腹内收，小平底。内外施红陶衣，上腹绘两组以赭色为地，内填白色网

纹的交错三角形图案，每组十四个三角形。

尊：泥质灰陶，折沿，高粗颈，深弧腹，平底。肩腹间一周凸棱，服饰凹弦纹。高41、口径22厘米。

缸：粗砂褐红陶，方唇，宽沿微折，大口，直腹，圜底。服饰凸弦纹和斜篮纹。腹下部弧收。高48.5、口径56厘米。

2： 玉、石器。

玉、石器共二十二件。通体精磨，形制规整。器形有斧、铲和纺轮等生产工具，以及镯、环、坠饰、绿松石等装饰品。玉器仅镯一件。

石斧，平面略呈梯形，横断面呈椭圆形，微弧刃，管钻孔。长9、宽2—4.5厘米。

石铲，平面呈长方形，横断面椭圆形，弧顶，微弧刃，四角较园，两面钻孔，涂朱。长11.8、宽7.5——8厘米。

3、骨、牙器

骨器主要有骨镞、骨匕、雕筒、残骨锥、鹿角、残龟甲等，牙器有束发器、残牙、梳、獐牙等。骨镞为扁园锥形、短链。

雕筒，三角形，转角处稍园，一侧穿二小孔，两端各刻凹弦纹三周。

束发器，猪獠牙的珐琅面磨制，一端穿一孔，已残。

4、蚌器和螺饰

这类器物主要有蚌斧、蚌铲、蚌刀、蚌匙、蚌壳饰物等等。

三、龙山文化的遗迹和遗物

(一) 文化遗迹

文化遗迹主要有灰坑、灰沟、房址等。

1、灰坑，一三九个。灰坑分布较密集，有打破关系，下面按下、上层灰坑分别介绍：

(1) 下层灰坑共有七十个，灰坑开口在第四层下，多数为圆形少数为椭圆形。灰坑的形制较规整，坑壁较直，坑底平坦。少数灰坑经过特殊加工，如黄沙土加工的硬底和二级台阶。圆形坑的口径一般为1.5——2.1米。

多数坑内为一次堆积，填黑灰土，质疏松，H62的坑底还遗存一层厚5——10厘米的鱼鳞和鱼骨堆积。出土遗物以陶片、兽骨、畜骨和蚌器为主。陶器的器形有鼎、鬲、甗、罍、罐、瓮、盆、碗、杯、算、器盖等。

(2) 上层灰坑

上层灰坑六十九个，灰坑开口在耕土或第2、3层下，有椭圆形、圆形和不规则形等几种，以圆形居外，均为锅形坑，未见加工痕迹。灰坑大小不一，一般口径为1——2米，个别大型灰坑有的口径达8.8米，深0.3——1.5米。

多数坑内为一次堆积，填灰土，质松软。出土遗物相当丰富，除大量陶片外，还有大量的兽、畜骨和蚌壳等，石器极少，个别灰坑还埋有人颈骨二个，是值得注意的现象。陶器有鼎、鬲、甗、鬲、罐、瓮、盆、碗、杯、盒、簋、器盖等。

2、灰沟（G1）

发现灰沟一条，开口在第2层以下，长条形，沟口距地表深0.45、长3.95、宽0.65—0.90米，沟底长3.73、深1.40——2.25、宽0.55——0.80米。沟底由北向南倾斜。沟壁加工齐整，留有木耒和石斧加工的痕迹。

灰沟内为一次堆积，填黑灰土，质松软，夹杂有草拌泥块，可能是F1的墙壁或房顶残块。沟内除出土大量陶片外，值得注意的是在沟底的中部和南端发现狗骨架四具，狗头骨一个，小动物头骨二个。出土的器物有陶罐、盆、鬲、甗、碗、杯、器盖和骨针、蚌铲、锯、刀等。

3、房址（F1）

房址一座。开口在第二层以下，距地表深0.45米。由于中、南部被灰坑打破，西南部被另一灰坑打破，加上后期扰乱，保存很不完整。从残存的居住面看，房子呈圆形，中部微凹，直径4.25——4.30米。门向东，方向130°，漫坡式门

道，坡度 17° 。门道长约1.75、宽1.5米。

房基系用草拌泥辅垫六层，每层厚4——6厘米，表面抹一层厚0.15——0.2厘米的白灰面，平整光滑。居住面上有一层不整齐的草拌泥土块厚约4厘米，可能是屋顶或墙壁塌陷的敷料。这种草拌泥土块在GI中也有。因此，房子很可能为土坯墙建筑。由于房址破坏严重，未发现柱洞和灶址。房内出土有陶片、骨锥和蚌刀等。

（二）文化遗物

文化遗物主要包括生产工具和生活器具。

1、生产工具，出土三一六件，其中以蚌骨、石、陶等质料的最多，角、牙器极少。

（1）、石器，计六十九件。绝大部分通体精磨，有个别细石器。有穿孔的工具，采用琢钻和管钻两种方法。器形有斧、铲、铤、凿、刀、镞、矛、丸、纺轮、砺石、研磨器等，其中以镞和铲的数量最多。斧，平面长方形，横断面呈椭圆形，平刃精磨，长7厘米。铲，长方形或圆角长方形，横断面呈长方形，穿孔。（略）

（2）骨、角器计八十七件。大部分保存完好，主要由动物的长骨和角制成。器形主要有镞、锥、凿、刮削器、鱼镖、锄、钩等。器物都经过加工磨制成形，如骨镞，通体精磨，棱形；骨锥，一端尖锋，一端平顶；骨镞，利用动物骨骼

加工成双面平刃等。

(3) 牙器计有八件。用猪獠牙獠牙磨制，器形有镞、凿、刀、锥，等。样式与骨、角器相仿。

(4)、蚌器计九十九件，由丽蚌属的多瘤丽蚌、矛蚌属的短褶矛蚌、剑状矛蚌和似褶纹冠蚌等加工而成。器形有铲、镞、刀、镰、锯、凿等。蚌器主要用自然蚌壳加工而成，刃部精磨，背部穿孔，如锯，刃部则磨成锯齿等

(5) 陶器计有五十五件，器形有网坠、拍、纺轮、丸等。拍，用灰陶加工成蘑菇状。纺轮，用陶片经打制后磨成圆饼状；网坠，有的用灰质泥陶捏制，有的用陶片打制成长方形、长条形或梯形，中心穿孔，两端的侧面刻凹槽，与现在的网坠相似。

2、生活用具

发现生活用具九四七件，绝大部分为陶器，有极少量的石、骨、蚌器。

(1) 陶器计有九一八件。其中复原一四一件，大部分出自灰坑，分为夹细砂陶、夹粗砂陶、泥质陶和细泥质陶四类。夹细砂陶的数量最多，主要有鼎、甗、鬲、罐等炊、贮器，也有碗和器盖。其次是泥质陶，主要有鼎、罐、盆、碗，瓮、杯、豆、箕、器盖和杯等。细泥陶很

少，陶质非常细腻，见于橙黄色小鼎和薄胎黑陶杯。夹粗砂陶极少，主要是小罐，个别的甗（音掺）有碎蚌片。陶色分黑、灰、红、白、橙等五种。其中灰陶占绝大多数，黑陶、红陶次之，白陶和橙黄陶的数量极少。除个别器物内壁为灰色、器表为黑色、或胎心为褐色、器表为黑色外，大都表里一致。

陶器烧制火候一般都较高，泥质陶的火候高于夹砂陶，质地坚硬，叩之声音清脆。个别器物，如覆盆式器盖，火候低，似未烧透，陶质松软。陶器的制法可分为轮制和手制，以轮制为主。轮制的器物一般较规正，器底轮旋纹清晰。手制器物主要是甗和小罐、小器盖。有的大型陶器，采用分段筑成法，如瓮的腹部以下为轮制，腹部以上则为手制，器内壁凹凸不平，器口径经轮修，然后粘接，器内粘接痕迹明显。陶坯一般经工具磨压或刮抹，有的器表尚留有篦状工具的刮痕。

陶器以素面占多数。大部分表面打磨精致，泥质陶的表面有光泽，常见的饰纹有蓝纹、方格纹、绳纹、弦纹、附加堆纹、锥刺纹、铆钉纹、镂孔、划纹和叶脉纹。篮纹粗而浅，施于甗、罐、盆的腹部。方格纹则拍印于甗、罐、盆的腹部。凹凸弦纹仅饰于鼎、甗、罐、瓮、盆、杯的

腹部和器盖盂碗上。堆纹仅饰于鬯、瓮。铆钉纹、饰于鬯、罐、盆等的近口沿处。锥刺纹和划纹施于鼎足和器盖。鏤孔仅见于豆和盘的圆足。叶脉纹饰于罐腹。

各种陶器又有几种不同的样式。例如鼎，可分为八种样式，I式为盆形，宽平沿，斜颈，扁圆腹，平底，鸟头形足；VI式则为罐形，侈口，束颈，弧腹，平底倒三角形足。其他陶器也各有不同的样式，其尺寸也有差别，不一一列举。

(2) 石、骨、蚌器

石器，有石坠饰一件，下端残，上端呈圆柱形，颈端两面磨薄，并穿小圆孔。骨器柄一件，圆柱形，一端中挖一空洞，洞深1.8厘米，另一端挖一凹槽，槽深1.2厘米，槽的两侧对称穿小圆孔一个。

骨器有骨针、骨笄（音吉）、骨牌等，骨针有二式，I式六件，磨制精细，一端有小孔，三棱尖锋。另一件为圆锥形。骨笄有扁圆锥形和圆锥形两种。骨牌一件，为长方形薄片，一端穿两小孔，另一端穿三小孔。

蚌器有蚌匙和纹蚌饰等。

3、卜骨及其他

卜骨共发现五件，皆为牛、羊肩胛骨经烧灼而成，无钻、凿等。

兽、畜骨发现较多，主要出於灰坑，种类有牛、猪、狗、鹿、獐、獾、四不象鹿等。

蚌壳亦较多，灰坑、地层均常见，有的成堆发现。其种类有丽蚌属的多瘤丽蚌，有矛蚌属的短褶矛蚌和剑状矛蚌，有的似褶纹冠蚌等等。有的蚌壳属海产种类的文蛤，我国沿海水域均有分布。

四 结 束 语

尚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的发掘，是我省考古工作者在鲁西、黄河以北地区进行的首次规模较大的科学发掘。文化遗迹、遗物丰富，为探讨大汶口文化和龙山文化的分布、类型和分期，以及与邻近诸原始文化的关系，提供了一批新的重要资料。

尚庄第一期文化在遗址中的分布范围较广，堆积较厚。但地层中包涵物贫乏，遗物主要出于墓葬。从墓葬的形制、结构、葬具、葬俗和随葬器物的组合（主要是鼎、罐、壶、鬲、背、壶）器物造型等方面看，与大汶口文化墓葬基本相同，且都有手握獐牙和獠牙的习俗。因此，这期遗存应属于大汶口文化系统，其年代相当于《大汶口》墓葬的中期和西夏侯下层墓葬时期。

尚庄第二期文化在遗址中的分布范围也较广，地层和灰坑中出土的遗物均较丰富。生产工

其中除常见的石、骨、陶、角器外，还有大量的蚌器。生活用具中的陶器，以夹砂和泥质灰陶为主，其次是泥质黑陶、泥质红陶和夹砂红陶，细泥灰、黑陶很少。陶器以素面和磨光为主，常见纹饰为蓝纹、方格纹、绳纹和弦纹，也有少量附加堆纹、划纹和锥刺纹。主要器形有鼎、鬲、甗、盆、罐、豆、碗、瓮、杯和器盖等。特别是长流粗颈袋足鬲、鸟头形足盆形鼎、器盖等，都是山东龙山文化常见的典型器物，虽然出现在山东龙山文化中未见到的罐形格纹罍，但与河南龙山文化常见的扁腹罍和斜肩折腹罍比较，有着明显的差异。从整个文化面貌看，我们认为本期应属山东龙山文化系统。

尚庄第三期文化的地层已破坏殆尽，遗迹也多遭破坏。从残存的大量灰坑、一座残房址和大量遗物，使我们对本期文化面貌有初步认识。生产工具除与第二期相同外，出现有带齿的蚌镰、骨凿和牙锥等，并首次发现山东龙山文化的卜骨。陶器仍以夹砂和泥质灰陶为主，其次为泥质黑陶和泥质红陶，泥质白陶和夹砂红、白陶极少。纹饰与第二期相同，但绳纹明显增加。主要器形与第二期相同，新出现鬲，未见罍。大型、厚重的器物大量出现。本期文化面貌比第二期虽然有新的发展，但基本面貌仍是一致的，具有更

浓厚的山东龙山文化的色彩。如陶器中的子母口，宽扁横耳，长流等及盲鼻、铆钉状圆饼等装饰技术，在山东龙山文化遗址中是较常见的。V字形鼎足在姚官庄、两城镇等遗址曾有发现，倒三角形鼎足在城子崖、尹家城、东海峪等遗址均有出土。肥袋状足与城子崖遗址出土的形制相近。所施用的纹饰与城子崖、尹家城等遗址，也基本相同，本期的文化面貌亦属于山东龙山文化系统。

尚庄第一期和第二期文化，从基本文化面貌看，存在着明显的差异。说明在文化发展关系中，它们之间尚有缺环。

尚庄第二期文化和第三期文化，从文化面貌看，它们既有密切的联系，又存在着一定的差别。如这两期的陶器都以灰陶为主，但后者灰陶所占的比例更大。在器表上，后者的素面比前者多，而磨光者则反之。纹饰上，后者的绳纹所占比例有明显的增加。在制法上，两期基本相同，但宽扁横耳、紧贴器壁的绳状耳、子母口、以及盲鼻、铆钉状圆饼等装饰，在第三期中有了更大广泛的应用。在器物造型上，两期文化既有共同的器物，第三期又有新的发展。如Ⅲ式盆形鼎，在第三期出现双腹状的；又新出现碗形鼎。第三期的鼎足除鸟头形和倒三角形外，又新出现V字形

鼎足。又如Ⅱ 2式和Ⅲ 2式鬻，两期都存在，第三期出现短流、短颈、瘦长腹的V式鬻。总之，第三期文化和第二期文化之间有着承袭和发展关系。

尚庄第二、三期文化面貌与鲁东及沿海地区以两城类型为主的龙山文化存在着较明显的区别。如尚庄龙山文化的灰陶占多数，精致陶器较少见，大型、厚重器物较多，出现拍印方格纹、绳纹，显然不同于两城类型。但这些却与鲁西城子崖类型的龙山文化面貌相当接近。虽然尚庄龙山文化遗存中，有些器物在城子崖类型的遗存中尚未发现过，如I式瓮、罍等，我们认为这可能是由于地域性的差别和时代上的早晚关系。尚庄龙山文化遗存中，有些因素与河南龙山文化相似，如白灰面的房址，片的出现，方格纹、绳纹的增多等等。这些因素说明，地处鲁西平原的尚庄遗址，由于临近河南、河北，在文化交流上更为广泛，互相之间的影响也更加明显。从尚庄第二、三期的文化面貌分析，应属于山东龙山文化的晚期的早、晚两个发展阶段。因此，这两期文化遗存的发现，为山东龙山文化类型的划分和分期提供了新的资料。同时，也为探讨山东龙山文化与豫北、冀南地区的河南龙山文化的关系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原载《考古学报》35年第四期，刊时有所删节）

器名解释：

石器：杵，一头粗一头细的园棒，用来在白里捣粮食或洗衣服时捶衣服。

骨器：镞，箭头。

笄，古代用来束发用的簪子。

陶器：瓮，一种盛东西的陶器，腹部较大，口较小。

甑，古代炊具，底部有许多小孔，放在鬲上蒸食物。

鬲，古代炊具，样子象鼎，足部中空。

鬻，古代陶制炊器具，有三个空心足。

算，有空隙而能起间隔作用的器的总称，如蒸食物用的竹算子，下水道口上用的铁算子等。

廌，古代炊具，中部有算子。

鼎，古代煮东西用的器物，三足两耳。

钵，陶制器具，形状象盆而较小，用来盛饭、菜、茶水等。

豆，古代盛食物用的器具，有点象带高座的盘。

尊，古代盛酒的器具。

盃，古代温酒的铜制器具，形“状象壶，有三条腿。

觚，古代一种盛酒的器具。

茌平县南陈庄遗址

一、地理位置、地层堆积与分期

南陈庄遗址位于茌平县城东南郝集乡南陈庄以西，距县城7.5公里。原为两个南北相连的土丘，因农民长年取土，平整土地，二丘已被削平，地面到处散布着商周和龙山文化的陶片。

遗址由茌平县图书馆调查发现。一九八〇年秋，山东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七八级学生实习时，在遗址北部边缘进行了试掘，参加试掘的还有聊城地区和茌平县的部分文物干部。共开七个探方，其中第四探方开在后世的一个大扰坑内，出有陶片，近代砖瓦等，经铲探，深达水位以下，故中途作罢；第六探方被整座汉墓占据，墓底浸水将近一米，发掘墓葬后即行放弃。实开方五个。

地层堆积与分期：遗址上分布着许多战国与汉代墓葬，而汉墓尤为密集，加之近世扰乱破坏，以致在深度2.5米以内地层非常破碎。由于水位浅，没有挖到底，至3.2米左右出水停工。自地表至水位线共分五层，以第二探方西壁为例简要说明如下：

第一层：耕土。厚20厘米左右，内有龙山、商周陶片，汉代砖瓦碎块及近代瓷片等。

第二层：土色较杂，上部疏松，下部较紧密，厚45—95厘米，包含物同上层，但数量较少，为近代扰乱层。此层扰破汉墓和战国墓的墓口。

第三层：灰褐色，较硬，厚35—75厘米，出有粗绳纹盆片及矮裆鬲等。

第四层：分A、B二小层。4A层土色较上层加深，质硬，杂有红烧土粒，厚35—75厘米。4B层是一片黄褐土，南边不及探方南壁，北边被第一探方的墓葬破坏，东西两边伸出探方之外。这块黄褐土打破第五层，打破面呈斜坡深入水线以下，深度不祥，系何遗址，尚难判定。二小层的包含物没有明显差别，出有石斧、骨镞、陶簋、半高尖足鬲等。此层与第三层为商周层。

（簋，音贵，古代盛食物的器具）

第五层：灰绿色，含水分多，土质较软。深度自2.2米以下至水线。出有篮纹直领横耳瓮、黑陶碗等，属于龙山文化。

二、龙山文化

（一） 遗迹，

1、房基 三座，深距地表2.4—2.8米，均为地上建筑，有白灰墙皮和白灰地面。F2圆形，仅揭露出一半，另一半因故未予发掘，墙厚26厘米，门向不明，未见柱洞。F3仅存一小片，墙基与地面结构与F1相同。F1方形、门向75°，南、北、西三面墙基部分或大部破坏，东墙基保存较好。墙土灰色，厚17厘米，残高16厘米，内抹厚约0.2厘米的白灰皮，墙下有基槽。北墙、西墙中部各有柱洞一个，南墙因破坏未见到；两柱洞大小相仿，西墙柱洞直径15厘米，深40厘米。室内面宽2.65米，进深2.9米，门宽0.65米。门两边各有一柱洞，北边柱洞直径10厘米，深30厘米，南边的直径6厘米，深与前者相等。地面分两层：上层是2—3厘米的灰色草拌泥，其下为厚8厘米的黄土垫层；下层是白灰面，厚0.2厘米左右，白灰面下垫一层5厘米厚的灰色土，再下是地基。西北角地面上有一片红烧土，应是灶址。地基分层，上层厚8—10厘米，以下泥水过多，情况不明。

2、灰坑，3个。H8为不规则圆形，口大底小，被三座汉墓打破。H11圆形，底略大于口，平底，口径2.1米，底径2.34米，深0.3米，内填松软的灰土。H6椭圆，口的长径1.4米，短径1.2米，底长径1.6米，短径1.4米，深0.48米，

底中部略高；填土与H11相同，出缺流白陶鬲1件。此坑位于F1北侧，紧靠墙壁，口距地表2.8米。

(二) 遗物分两部分，一是石、骨、蚌器类，二是陶器类。

1、石、骨、蚌器，此类器具应属生产工具类。有石斧1件，残，黑色，磨光，体扁平，平顶，两边钝圆，孔对穿，下端自孔部断掉。石刀一件，残，灰细沙页岩，长方片形，单片刀，存半个孔，孔对穿，残长4.5、宽4.6厘米。骨凿，2件，劈取长骨磨制而成，两面磨刃。一件为扁长条形，磨制较精，顶端一自然孔，长15.6、刃宽1.4厘米。角锥，2件，用鹿角尖磨制而成。蚌镰，1件，半成品，将蚌片切割成镰形，背部磨过，但未磨出刃，长13.1厘米。穿孔蚌片，出土数量不少，多残破，较完整者一片。

2、陶器

陶质以夹沙陶居多，占61%；其次为泥质黑陶，占12.7%；泥质灰陶占11.1%；橙红陶、红陶占4.8%；褐陶占2.7%；黄陶占2.1%；白陶占0.2%；蛋壳陶偶有发现，厚度超过0.1厘米。黑陶多黑皮，一般灰心，褐心者很少，纹饰中篮纹占15.3%，方格纹占10%，绳纹占4.3%，附加堆纹占2.1%，弦纹占10%，素面磨光占57.6%

其中篮纹、方格纹形式多样，拍印不甚整齐，多有交错现象，细线条棱角分明的斜方格纹虽有，但为数极少。有的瓮口、肩部黑色磨光，以下灰色拍印篮纹。制陶普遍采用轮制技术，简单的小型器，多是一次轮制而成；罐是上下段分别轮制，然后对接捏合；瓮的底部轮制，腹部手制，口部轮制或经慢轮加工；甗的腰部以上轮制，以下泥条盘筑，袋足有的轮制，有的模制，大型袋足还在上部加筑泥条。凡分段制做的器物都有明显的接合痕迹。可复原的陶器不多，主要有深腹罐、瓮、鬲、大口罐、盆、碗、杯、器盖等。

（三）小结

第五文化层的陶质、陶色、纹饰及陶器制作方法等与在平尚庄第三期基本一致，鼓领鼓腹盆形鼎、小横耳罐、盆形碗等器形也与之相同。其中小横耳罐、盆形碗又见于泗水尹家城龙山文化第三阶段。Ⅰ式孟见于禹城邢寨汪，Ⅱ式孟见于梁山青堎集、尹家城龙山第三阶段，黑陶平底盆与邢寨汪的黑陶盆相似，夹沙灰陶深腹罐与安阳后冈二期的Ⅱ式绳纹深腹罐相同。由此确定该层为龙山文化晚期，其绝对年代应与安阳后冈二期的灰坑H2相同。这个灰坑的 c^{14} 测定年代是公元前1960 \pm 90年，经树轮校正为公元前2340 \pm 140年。

南陈庄遗址与在平尚庄、禹城邢寨汪属于同

一个文化类型，与青堍集也基本一致。多数意见认为尚庄二、三期属于山东龙山文化，南陈庄遗址的发掘证明这个意见不误。这个遗址大多数陶器是山东龙山文化所特有，这些器形不仅见于尚庄、邢寨汪和青堍集，在泰山周围至滕县、枣庄一带也广为存在，有的在东部地区也有发现，甚至是那里的典型器。除上面已提到的尹家城的几件外，尚有：子口横耳罐、鼓的肥大袋足与城子崖出土的一样；小横耳罐又见于曲阜东魏庄、枣庄二疏城；鼓领鼓腹盆形鼎见于曲阜韩家铺、潍坊姚官庄；有领深腹盆见于姚官庄、尹家城、大口罐见于滕县大韩、曲阜北店头、尹家城、二疏城；盆形碗又见于城子崖、姚官庄、滕县吕楼、诸城呈子；盂又见于城子崖、枣庄晒米城、诸城呈子；算见于城子崖、尹家城；直领横耳瓮、盆见于尹家城；素面鬲见于城子崖。这些器物在后冈二期和豫东至山东荷泽一带的“造律”台类型遗址中不见或少见，而后冈二期的绳纹鬲，“造律台”的大口尊形器、澄滤器、漏斗形器及二者共有的圈底罐形鼎、叉腹盆、盆形甑等则不见于南陈，也不见于尚庄、邢寨汪和青堍集，说明南陈庄也与尚庄等三遗址一样，与泰山周围山东龙山文化的关系十分密切，尽管其中有大量后冈二期的成分，但与山东龙山文化的内容相比，则

处于次要地位。

三、商周文化

南陈遗址商周文化包括两个文化层，即第三、四文化层。现分层介绍。

第四层：

(一) 遗迹：灰坑四个，均为不规则圆形，全被墓葬和扰坑打破。除H5外出土陶片都碎小，不辨器形。H5是个大型灰坑，因靠近水井没有全挖，只挖了在T5内揭露出来的一小部分。坑口距地表0.8米、深1.96米，填土分四层，内含水锈。各层出土陶片基本一致有鬲、罐、豆、钵等。

(二) 遗物：遗物主要有石、骨器和陶器。

石器有石斧1件，灰色，扁长条形，平顶，两边钝圆，两面磨刃，中部偏上对穿一孔。

骨器计有骨锥2件、骨针1件、骨镞2件，骨饰品2件。骨锥扁圆条形，用小肢骨磨尖稍加修整而成。

陶器主要有鬲、簋、钵等，另有罐、盆、豆、瓮、甑、的陶片和残器。陶质以泥质灰陶占多数，夹砂灰陶、夹砂红陶次之，夹砂褐陶少

量。纹饰以绳纹占大多数，弦纹次之，附加堆纹、三角划纹少量。

第三层：

第三层的遗物有石、骨器和陶器。

石器有石镰1件，石铲2件，石杵1件。石器多残，都经人工磨制。石镰，直背，单面刃，前端上曲，灰绿色细沙岩，加工粗糙。石铲，扁平，弧刃，两边钝圆，磨光。石杵，顶端稍残，呈上细下粗之圆棒形，杵头为弧面。褐色沙岩磨制。

骨器主要有骨锥、骨匕、骨管等。骨器也都经过磨制加工，如骨管系截取一段肢骨，两端磨平而成，中部穿一孔。

陶器，器形有鬲、盆、小筒等。陶质以泥质灰陶占多数，夹沙灰陶次之，褐陶少量，红陶少见，纹饰多粗绳纹，弦纹不多。如鬲，方唇，宽沿，浅袋足，裆近平，夹沙黑灰陶，粗绳纹，口径22.2、高12.6厘米。

残器有盆等。

（三）小结

第四层的鬲片T2④：19较薄，方唇下缘成尖角，具有二里冈上层特点；陶钵与邢台曹演庄下层的一件相同。盆片T3④：4细泥质，绳纹较细，薄圆唇，沿外翻，也是较早的特征，应与上

二器同时。半高尖足鬲与殷墟文化第一期的相同。鬲片T2④：13窄沿，鼓腹，与殷墟西区BⅡ式鬲很相似。粗短的鬲足则是大司空村第一期的特点。簋与殷墟西区的CⅠ式簋相同，属于殷墟第三期。残簋T2④：(16)与殷墟西区的BⅢ式簋、山东平阴朱家桥的IV式簋相同。以上说明这层文化堆积自二里冈上层一直延续到殷墟晚期。

第三层的矮裆鬲在安阳大司空村晚期、后冈杀殉坑都有出土，残盆T1③：7、T1③：8粗绳纹，并且仅施于腹上部，中间又横抹一道，也与后冈杀殉坑的作风一致，属于殷末周初。

采集的敛口收腹瓮与尹家城岳石文化层出土的一件相同，同类器物还见于郑州晁昏王、山西东下冯偃师二里头小口尊作风也很一致；夹沙褐陶罐口，就其陶质、陶色、器形看，与尹家城岳石文化的侈口深腹素面罐非常相象，也许就是这种罐口；花边小罐显然是“二里头”的东西。这些陶片的出土，说明该遗址有岳石或二里头文化的内涵。其他层有待今后发掘寻找。

四 墓 葬

这次发掘南陈遗址墓葬计有战国墓一座，不同的汉墓12座；均有出土遗物。

鬲 (一) 战国墓，一座，编号为M4。竖穴土坑，四壁近于垂直，有熟土二层台。底长2.55米、宽1.53米、深距地表3.60米，墓口被破坏，距地面约0.7米。因出水未见棺痕，骨架大部朽坏，尚存部分肢骨，仰身直肢，方向约25°。填土较硬，似经夯打，但未见夯窝。随葬品置于骨架右侧，有二件铜器，一件铁器。铜器有铜戈一件，短援微扬，直内，内一穿，胡长中等，栏侧四穿。铜剑一件，园茎，双箍，窄格，剑身起平脊。铁器一件，长板形，一端较宽，一端较窄，宽端缺一角，近窄端的三分之一处一园孔。

(二) 汉墓

1、墓葬形制：

均为小型竖穴单葬墓，分土坑、砖椁等种。

土坑墓，2座。M1浅而狭小，未见棺痕，头向东，头左上方置一陶罐。M9墓底长2.86米，宽1.26米，正中一长方形沟槽，槽长1.78米，宽0.66米，深0.10米，内铺整残砖18块，人架置于其上，仰身直肢，方向87°，左胸压一整砖。

砖椁墓，9座，皆用顺砖错缝筑椁室，除M7因破坏情况不明外，共有三种形式。

① 在椁之一端砌有似头箱或足箱龕。有三座墓是在椁的头端或足端用侧立砖依椁壁围砌一长方小龕，内置1—2件陶器，用砖封置。

以M6为例，椁长2.61、宽1.18、高0.74米，底用二砖顶一砖的方法平铺，龕在足部，龕内空间长0.54、宽0.24、高0.43米，内置陶罐一件，椁底有棺灰，人骨朽为粉末，但可看出是半侧屈肢，方向95°。

② 设头箱。二座墓。M5在椁内偏东处砌一横墙，将椁分隔为头箱和椁二部分。M10椁和头箱分别建造，在建造过程中破坏了M7。椁长2.61、宽1.73、高0.79米，用斜行砖铺底。头箱建于椁东侧的M7内，是在椁东壁与M7的东壁之间砌筑二道东西向矮墙构成。箱空长（东西）0.83——0.98米，宽1.2米；箱底正中一东西向凹槽，与箱等长，宽0.48——0.154米，深0.20米，两边用单砖镶口，随葬器物置于槽内和南边的镶口砖上。棺室和头箱用斜行砖铺顶，其下有板灰、短整砖原铺在盖板之上。在棺室盖板和铺顶砖的南、北、西三边有二层顺砖砌筑的边框，在边框和铺顶砖间的缝隙与头箱铺顶砖的边缘上，又用一层顺砖封压。棺内有棺灰，骨架朽坏，尚存肢骨，仰身直肢，方向95°。

③ 仅一砖椁，有三座墓。其中仅M11随葬一件陶器，置于椁北壁之外，用一整砖压口。据群众讲，此类墓的随葬陶器亦有放在椁内或椁外四角的。M11椁长2.32、宽1、高0.77米，底用平砖

错缝顺铺，内有棺灰与骨架一具，仰身直肢，方向 12° 。

还有一座墓（M14），形制比较特殊。平面呈凸字形，墓底长3.3、宽1.6米，深距地表2.2米，凸字头在墓室东端，长0.9米、宽1.18米，南北两边有高0.92米的砖墙，墓底铺一层瓦片和陶片，厚10厘米左右，又以瓦片、陶片封填，厚1.05米，以上为填土。铺底陶片上有朱色漆和棺灰，人骨大部朽坏，仰身直肢，方向 87° 。随葬陶器和漆器放在凸字头之内；陶器完整和基本完整者二件，破成几片者一件，漆器1件，残迹呈正圆。矮墙之上未曾加盖，陶片是小心堆砌在器物的周围，起到保护作用。

2、墓砖

出土墓砖有大中小三型。大型砖长50—51.8厘米，宽24—25.5厘米，厚7—8厘米，表皮灰色，里面黑色，质地疏松，掺杂大量麦糠碳化的麦糠团、麦壳、麦粒清晰可见；出土时极易破碎，干后坚硬。说明制砖技术还在初期阶段。M5墓砖在大型和中型之间，但质地与大型砖接近，故归大型一类。中型长43—45厘米，宽19—20厘米，厚6—7厘米，里表黑色，比较坚实，除M8、M14的砖外，仍杂有少许植物白灰。小型砖长27.5—28厘米，宽12.5—13

厘米，厚3——3.5厘米，灰色，亦有内黑者，质地比较坚硬，无植物掺和。

3、随葬品

十二座墓中，M7、M12遭破坏，原有无随葬品已无从知道，其余十墓只有七墓出陶器，一般每墓1——2件，M14出土3件，并有一件漆器，是个例外。M19除死者口中含一枚半两钱外，别无他物。M5有头箱，应有随葬品，但却没有发现，估计随葬的是竹木漆器之类，因年久腐朽，加之墓内浸水深近1米，妨碍清理，所以见不到痕迹，各墓出土遗物共16件。

陶器，11件。罐5件，泥质灰陶，分二型三式。鼎，2件，泥质灰陶，其一平口，腹深中等，圜底，长方附耳，方穿不透，三足各异，二蹄足，一扁足，覆钵形盖。原有彩绘，出土时脱落。通高17厘米。壶，4件，分三式，其中一件泥质灰陶，彩绘，在白彩地上用朱、黑二色绘出卷云纹，已大部脱落。另一件泥质褐陶，质软，盖与腹部彩绘，在白粉地上用朱、黑、黄三色绘卷云纹。

铜带钩1件，钩基圆形，短颈、颈断面方形，钩折较长，圆纽。

半两钱3枚，分二式，锈蚀较重，直径2.4厘米，表面灰绿色。

铁带钩1件。锈蚀严重，钩折较短，圆纽，

长4.4厘米。

另外，M10、M14内有漆器残迹，以M14的最清楚，红色，圆形，M6人骨下肢右侧有一小堆粟壳。

4 分期

十二座汉墓有打破关系的六座：M8打破M11，M11打破M10，M10打破M7，M14打破M12。因此，它们的早晚顺序是：M7最早，M10、M11、M8依次而晚；M12的墓砖与M11的相同，时间也应一致，所以M14亦晚于M11。

M2、M3、M6设龕，与北京昌平等地汉初墓葬在木椁或棺前设置头箱的作法一致；M2的陶壶与江苏涟水三里墩西汉墓的铜壶相仿，具有战国风格，与昌平白浮村汉墓I式陶壶的作风也很相似；M6的陶罐与北京西郊白云观出土的西汉早期陶罐相同；M3的陶罐在北京地区亦属西汉早期，因此定这三座墓为西汉前期，M7为大型砖，与M2、M6相同，时间也应一致。

M11的陶罐与天津北郊双口镇西汉墓的陶罐完全一样，时间应相同。双口镇汉墓是一座瓦建二次造双棺室墓，而二次造双棺室墓在洛阳地区出现于西汉中期之初；出的陶壶与满城一号汉墓的Ⅱ式壶基本一致，只是壶颈斜直、较粗而已，似乎稍晚一点，但不妨为同时之器。因此M11也与满城一号汉墓同时，属西汉中期。

M10被M11打破，故早于满城一号汉墓。满城一号汉墓之主刘胜死于武帝元鼎四年，入西汉中期仅五年，由此估计M10应早到西汉前期。出土的陶壶与徐州子房山西汉前期的二号墓彩绘陶壶相似，应为同时。二壶虽有假圈足与圈足之别，但假圈足在西汉前期就已出现，所以不妨碍为同期器物。故M10属西汉前期大概不误。

M11的陶罐变为卷沿，腹变矮，最大腹径上移，说明较Ⅰ、Ⅱ式罐晚，但不会晚于扁园腹、上腹素面的巨野红土山西汉墓Ⅰ式罐，而口沿下卷则与江苏铜山县小龟山西汉崖洞墓的Ⅰ式罐相同；二墓均属西汉中期，M11应与之同时。

M14陶器组合为鼎、壶、罐，与北京地区王莽前后的墓葬相同，陶器制作粗糙、陶质低劣，鼎小无耳，也与之相同，时间应一致。

五 结 语

南陈遗址第五层即有山东龙山文化的内容，又有后冈二期的因素，与造律台类型也有共同点，十分复杂。目前对这类遗存的归属意见分歧，通过这次发掘将有助于这个问题的解决。

鲁西是山东龙山文化与河南龙山文化的接触地带，是探索两文化间关系的重要地点。南陈的

绳纹深腹罐与后冈二期的H2：3深腹罐如出一人之手，无疑为同时之器，从而使两个文化有一个共同的时间刻度，这对进一步研究二者的关系是重要的。

“岳石”和“二里头”陶片的发现，在鲁西尚属首次，特别是两种陶片在一个遗址同出是个新情况，对研究东夷、夏二族的关系提供了新线索。

这次发掘还为我们了解这一地区的商文化提供了资料，对这一带的汉墓也有了一定认识。

（原载1985年第四期《考古》杂志，刊时有删节）

名词解释：

文 化

什么叫文化，有如下几方面的含义：

①指人类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特指精神财富的，如文学、艺术、教育、科学等。经过人类生产、创造的物质财富，如生活用品、生产工具、建筑物等等都可称文化，古代的称古代文化，现代的则称现代文化。②考古学用语，指同一个历史时期的不依分布地点为转移的遗迹、遗物的综合体。例如，在山东某地发现的商代遗物与在其他省地发现的商代遗物，同称商文化。同样的工具、用具，同样的制造技术等，是同一种文化的特征，

就以同一种文化特征来定名某某文化，如仰韶文化、龙山文化等。③指运用文字的能力及一般知识，如学习文化、文化水平等。

旧石器时代

大约在四、五十万年以前，原始人类在生活和劳动中，已经能够制造和使用简单的工具，这种工具是把天然的石头砸打成粗糙的石器，有一定的形状，例如石刀、石锤等，这类工具仍具自然形态，这一时期就叫做旧石器时代。他们用石刀把树枝砍削成木棒，用石器和木棒等工具采集植物的根、茎、种子和果实，猎取动物，作为食物。

新石器时代

大约开始于七、八千年以前。人类经过长期的劳动，思维能力大大提高。这一时期的主要特点是，人们能够把石头打制成的刀、凿、斧、铲等一定形状的工具，加工磨制的光滑、锋利。还能把骨、角加工成针、锥、鱼钩、鱼叉等。在一些工具上钻了孔，以便装柄和穿绳。还发明了弓箭，箭头是石制的或骨制的，射击远处的鸟兽。已发明了农业和畜牧，生活资料有了可靠的来源，开始定居生活，已能够烧制各种陶器，并在陶器上划些花纹。已开始种麻、纺线织布，建筑简单的房屋，避风雨，供居住。这一时期称为新石器时代，我国各地普遍发现不同类型的新石器

时代文化，重要的有仰韶文化、马家窑文化、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等。

仰韶文化

我国新石器时代的一种文化。1921年首次发现于河南渑池仰韶村，故名。主要分布于黄河中下游。生产工具以磨制的石器为主，常见的有刀、斧、铤、凿等。打制器仍占一定的数量，骨器相当精致。日用陶器以细泥红陶和夹砂红陶为主。细泥红陶上，常有彩绘的几何形图案或动物形花纹。当时的经济生活以农业为主、渔猎为辅，并饲养猪、狗等家畜。属母系氏族公社制的繁荣时期。由于它的遗物中常有彩陶，所以也曾被称为彩陶文化。据碳—14法测定，整个中原地区的仰韶文化，包括不同时代的各种类型，约为公元前5000—3000年。

大汶口文化

我国新石器时代的一种文化。1959年首次发现于山东宁阳堡头村，因遗址位于堡头村西和泰安大汶口一带，故名。主要分布在鲁西南和苏北一带。大汶口文化的主要特点是：在许多遗址中都发现氏族公共葬地，各墓之间有随葬品多寡的悬殊。晚期墓葬中且有男女合葬的现象，这时可能已进入父权制。生产工具以磨制石器为主，骨、角、牙器也多而精致。陶器以灰陶为最多，

红陶次之，黑陶和白陶各占一定的比例，也有少数的彩陶。从地层关系和陶器特征上，都证明大汶口文化是这一地区龙山文化的前身。据碳—14法测定，大汶口文化大约开始于公元前四千五百年或稍晚，大约公元前两千五百年前后过渡为龙山文化。苏北一带的所谓青莲岗文化，也应属于大汶口文化的范畴。

大汶口文化早期，距今五、六千年，处于母系氏族公社阶段；中晚期距今四、五千年，处于父系氏族公社阶段。

龙山文化

我国新石器时代晚期的一种文化。1928年首次发现于山东章丘龙山镇的城子崖，故名。主要分布于黄河中下游。龙山文化的主要特点是：生产工具有很发达的磨制石器，出现了石镰、蚌镰。陶器已开始用轮制，以灰陶为主，黑陶次之，红陶和白陶极少。除平底器外，有圈足和三足的，纹饰有绳纹、篮纹、方格纹、弦纹等，还有镂孔的。此外，还出现了卜骨。经济生活以农业为主，有较发达的畜牧业。据碳—14法测定，河南地区龙山文化的年代，约为公元前2800—2300年。属父系氏族公社制时期。沿海地区的龙山文化中常有一种薄而有光泽的黑陶，所以也曾被称为黑陶文化。

王曰高墓及墓志铭

王曰高，字登儒，号北山，在平镇北八里庄人。清顺治年间中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当地人尊称王翰林。

王曰高墓地原在本村西南半里许，整个墓地约十余亩，植有松柏等树，郁郁葱葱，风光悠雅。曰高墓占地约半亩，墓前有石碑数十座，其中有一座蛟龙碑，上有康熙皇帝为王曰高亲书的碑文；另有王曰高的学生，清状元张英写的墓志文等碑。曰高墓棺椁外系用三合土所培，三合土外用青砖砌成砖甃，再外边用长1.35丈，宽3.5尺，厚9.5寸的石块围起来，石块之间有石槽勾连，缝中灌有铁汁子，最后再用土全部封起来，整个墓十分坚固。

曰高墓在文革中被扒开，棺木尚完好，遗物不多，有一个玉雕花瓶，内插一枝梅花，瓶和梅花是用一整块玉雕刻而成，玉的蓝色为花叶，玉的粉红色为花瓣，瓶花高约五寸，有花五朵，叶七片，非常别致美观。曰高夫人王恭人墓内有玉蛙一个，高约4寸，也按玉的颜色雕成，白色为蛙的腹部，蓝色为蛙的上背。此二物文革后均遗失。

王曰高墓内有墓志铭碑一块，现保存完好，铭文共二十六字：“皇清中宪大夫内升四品京堂礼科掌印给事中北山王公墓志铭”。文体为小篆，只有“𠄎”（升）字系用战国《安邑下·官钟》文字，较难辨认。文中“中宪大夫”、“四品京堂”、“礼科掌印给事中”皆为清朝的官职名称。

现存王曰高长子王云初墓志铭一块。王云初先父早卒，故王曰高为其子立墓志铭，由清进士孙光祜（王曰高亲家公）撰文，王曰高亲自书丹，字为小楷，隽永清秀。此碑立于清甲辰冬十月，即清康熙三年（公元1664年）。

据《王氏家谱》和《茌平县志》记载，王曰高自幼勤奋好学，轻资财，重然诺，喜读楚辞，晚爱山水。清顺治八年中举人，顺治十二年中进士，顺治十五年经殿试授翰林院庶吉士，顺治十八年改授工科给事中，首疏勤学亲贤以端蒙养、以隆治本。康熙元年转工科右给事中，有请颁监板经书诸疏；康熙二年主考江南得张英、王项龄文武状元；康熙三年转兵科左给事中；省亲，三年丁内艰；服闋，康熙七年起旧职；康熙十一年补户科左给事中，有请纠天津大帅及江南巨蠹之为民害者诸疏；康熙十二年特旨御试台省，擢礼科掌印给事中；康熙十六年，连疏请卹死节诸

臣，賑濟江淮；仁廟特御使殿再奏，擢正四品京卿，誥授中憲大夫。康熙十八年，王曰高在故鄉病卒；康熙二十年崇禮鄉賢，三十五年奉旨立專祠于在平城北街，享春秋祭典；配王氏 誥封 恭人，卞氏封安人；子四，皆儒術知名之士。

王曰高的著作有《槐軒集》十卷行世；《在平縣志》有他的文章、詩詞十數篇。關於王曰高的傳說，當地流傳很多，如王曰高幼時上學，因家貧，中午放學後到棗行揀落棗充飢；王曰高曾當過康熙帝的老師，因此王家曾珍藏有康熙皇帝為王曰高備馱的圖影（已失傳）；群臣參奏八大宮（康熙八叔）擾亂內宮之事，未經王曰高知道在奏折上第一個先寫上了王曰高的名字，有“拿了八大宮，吓死王翰林”的傳說等等。

注釋：

1、舉人、進士：舊時各地經鄉試推薦入京考試的人被稱舉人；經過殿試合格錄取的人稱進士。

2、庶吉士：在清代，選新進士之優於文學書法者入館學習者，稱為翰林院庶吉士。

3、工科給事中：明清時期在午門前東西兩排設吏、戶、禮、兵、刑、工六科房辦事，有都給事中、左右給事中、給事中等若干人，與御史的職權和地位相

- 近，而又不属于部院所辖。其主要职能是：备顾应对，讨论政事，掌驳政令之违失，钞发章疏，稽察违误等，其权颇重。
- 4、丁内艰：即丁母艰，母亲死了儿子守制叫丁母艰。丁艰、丁忧统称父母之丧。
 - 5、服阕：旧制，父母死后守丧三年，期满除服，称为“服阕”。阕是终了之意。
 - 6、四品京堂（卿）：一种官职名称。
 - 7、中宪大夫：一种官职名称，清代高级文职官员称大夫，武职官员称将军。
 - 8、擢：提拔、晋升之意。
 - 9、疏：对皇帝的进言，也称奏章、奏本。
 - 10、诰授：皇帝对五品以上官员的封典叫诰授或叫诰命。

韩国玺墓

韩国玺，字鬯兰（鬯音昌，同畅）别号晴岚，明朝举人。韩国玺墓在城西南韩家集，有清翰林院检讨景陵谭撰写的墓志铭。

韩国玺自幼为人忠正，天性淳厚，待人至诚。二十岁时精研太极图、皇极经等诸书，深悟书中大意和精神。明神宗万历四十年（1612年）秋，韩国玺应试中乙榜（也称一榜，即取中举人名次的布告）为举人。于是名声大振，相与结交的文人墨客日益增多，朝廷的督学使称他为理学根基。韩国玺乐施予、好大义，有一年闹饥荒，其父煮粥以济灾民；但是饥民日众，而谷将尽，麦秋不接，其父忧形于色。韩国玺立即慷慨地拿出百金赠送灾民，从而使饥者赖以生存。明熹宗天启四年（1624年）被推荐为孝廉公。明毅宗崇祯十年（1637年），韩国玺与其门生中秋赏月，谈论国家局势，他说：邹康节闻鸟鸣而知宋乱，今异鸟食麦根，天下可知。其意思是说明朝气数已尽，快要亡了。他与门生终日讲学，探求道理，不做官也不遗憾。由于整天讲学，不过问田里耕种之事，家境渐渐贫寒；崇祯十三——十四

年（1640—1641年）间，四方闹饥荒，韩国玺也常常断炊，生活十分困难，但是他却十分乐观，神气自若。

清世祖顺治二年，大清江山已定，局势逐渐平稳，韩国玺被授知湖北潜江县令，自带一仆从步行千里上任。他一到任马上招集流民百姓，给百姓耕牛种田，生产足够的粮食以生养休息；并办教育、立学校，与弟子一并讲学。韩国玺当县令二年，一尚清简，秋毫无犯，常以青菜、碱菜、粗粮进餐，活象苦行僧济公，他的同僚及上级官员视他为迂阔无为；有鄙笑而厌薄之情。韩国玺虽然这样贫穷、清简，那些得不到他财礼贿赂的人竟散布流言中伤他，韩国玺愤而归乡，离任时犹如一个仆人一样一无所有，潜江县百姓哀泣悲呼，拉着韩国玺的衣服不让他走，有许多老百姓和乞丐数百人凑千钱、斗米及食物给韩国玺，可见当地百姓对他的爱戴之情至深。韩国玺归乡后仍致力于学，无疾而终。

韩国玺有一篇文章很受人们重视，叫《劝业三书》即：一曰正心术：读书人必须端正思想，除却邪念，打好基础，才能达到知识渊博，成为有用之人。二曰修道德：一个有道德的人才能有名誉，想事、做事都要方便于人，多做善事，少做恶事，积下阴德，开辟一条进入仕途的道路。

三曰要谦虚：读书人要放眼天下，胸怀古今，学无止境，切不可自满骄傲，成为轻薄之子；因此说学生不一定不如老师，老师也不一定胜过学生；要做到学然后知不足，才能达到更深的境界。

注释：翰林：唐以后皇帝的文学侍从官，从进士中选。

翰林院：清代翰林院掌编修国史，记载皇帝言行，起居注，进讲经史，及草拟有关典礼的文章。

检讨：翰林院官名，掌修国史，次编修。明清一般以三甲进士之留馆者为翰林院检讨。

张 后 觉 墓

张后觉，字志仁，学者称之为弘山先生，明代在平县北张楼人。《在平县志》说，张后觉墓在城北义庄（即冯屯镇张楼村），有状元张元忬为之撰表（张元忬，明浙江山阴人）。

《明史》记载，张后觉，号文祥，由乡举人任广昌知县（广昌即现在的河北涞源县）。后觉自幼聪明颖敏，才智过人，崇尚王守仁的学说，远近有名。后来他考取了岁贡生，被授于华阴训导职位时遇大地震，张后觉负责救灾扶伤，安抚百姓功绩卓著，人皆悦服。致仕归乡，华阴县的黎民百姓不愿张后觉走，流着眼泪送他上路。东昌

（举人，进京应试的人。岁贡生，每年选入京师国子监读书的人。华阴，即现在的陕西省的华阴县。训导，学官名，太师、太傅、太保三师皆为训导之官，明、清各府、州、县皆设）。

知府罗汝芳，提学副使邹善皆崇学王守仁的学说，与张后觉志同道合，邹善建立了“愿学书院”，罗汝芳亦建了“见泰书院”，邀集四方学士，互相学习讨论，这样还嫌结识的朋友不广，北走京

师，南游江左（大约三国东吴所辖江东地区），广为讲学，门人弟子大增。后来凡是到在平当官的或外任路过在平的官员，都要到张后觉的家里请教学问；巡抚（明代朝廷派往各地巡视抚察的官员）李世达两次到张后觉的家里请教，当时后觉抱病，犹卧席而谈，会友论文，莫不赞誉。

张后觉的门生很多，尤以在平县的孟秋、赵维新成绩最为显著。孟秋字子成，别号我疆。隆庆五年（1571年）进士（经殿试合格录取的人称为进士），初为昌黎知县，官至大理评事，刑部主事等职。孟秋自幼凝重端淳，读诗书即通大意，不为训诂所束缚，世人称大儒。赵维新，年二十以张后觉为师，将与师互为问答语集为“弘山教言”一册。《明史》记载，赵维新性纯孝，居丧，五味不入口，瘦骨如柴，拄杖而行。丧妻后五十年不再娶。有一年修筑垣墙，挖得黄金一筐，全由工人分去，自己分文不取。赵维新虽家贫，然而超然自得。后以岁贡生为长山（县名）训导，年九十二岁无疾而终。

张后觉于明万历六年卒（1578年），终年七十六岁。

《在平县志》记载，孟秋墓在安平镇，赵维新墓在叶官屯。

注释：王守仁，明代浙江余姚人，世称阳明

先生，字伯安。明朝时期的哲学家、教育家。他的主要理论思想学说是“致良知”，把封建伦理道德说成是人生而自有的“良知”，断言“夫万物事之理不外于吾心”，“心明便是天理”，否认心外有理、有事、有物等等。

提学副使：宋时各路设提举学事司，管理各州县学校和教育行政。清初相沿，各省多设督学道，雍正四年改提督学院，长官称提督某省学政，简称学政（也有称提督的），清末改设提学使。

石勒墓

据《在平县志》记载，“在邑城南十里铺，兴隆寺后，旧志曰铁墓，未著其人；乡人呼为王坟，问其故，曰石勒墓也，石勒嘗自立为赵王，改号建国，咸和五年称皇帝……”。

石勒，西晋时期上党（属山西）武乡羯人（胡人的一个部族），有胆力，善骑马射箭，晋永兴二年（305年）并州遇灾，（并州，晋时辖山西大部、内蒙古、河北一部）石勒被掠卖为在平县师藩家为奴。当时在平一带为牧马地，石勒与牧师汲桑友好，结壮士为群盗，劫掠富户以为生。公师藩起兵反晋，汲桑率石勒等百余骑归公师藩，随军征战。连克郡县，进攻邺城。光熙元年（306年）公师藩被晋军斩杀，汲桑和石勒逃还在平牧苑，重整旗鼓，声言为成都王颖报仇，以石勒为讨虏将军，攻破邺城，遂纵火烧邺宫十日不息，大掠而去。

永嘉元年（307年）十月，石勒脱离汲桑率数千胡人归汉，汉王刘渊授石勒为平晋王。十二月，汲桑被晋军所斩。

东晋大兴元年（318年）汉主刘曜（耀）即皇帝位，史称前赵。大兴二年，因石勒征战功著，

授赵赵王。同年，石勒部下将佐力尊石勒为赵王，建赵国，统二十四郡，史称后赵。

咸和五年（330年）二月，后赵群臣请石勒即皇帝位，石勒谦称大赵天王，行皇帝事，立皇后、太子，封王封将。九月，即皇帝位，建都邺，营建宫殿。咸和八年（333年）七月，石勒病卒，年六十。其子石弘继位。

据《资治通鉴》记载，石勒死后，其子夜间将其尸体秘埋山谷，第二天虚葬于高平陵（今咸阳市西北）。在平县有石勒墓，旧县志有记载，是虚置。“石勒墓”在在平县十里铺东北角的一个大土丘上。1975年，国家和省、地、县文物考古工作者对大土丘进行了发掘，经试掘发现这里是从汉到南北朝时期的墓群，还出土了大量的器物、陶片，多属龙山文化遗存。

注释：

1、刘渊：新兴匈奴冒顿之后，（冒顿读末堵）冒姓刘，字元海，西晋惠帝时带兵镇邺。永兴元年，八王乱起，渊叛晋称汉王，永嘉二年称帝，永嘉三年（公元309年）卒。

2、邺：古地名，故址在今河北省临漳县西南邺镇一里半。

马定国墓

据县志记载，马定国墓，在城南兴隆铺侧，（即现在的十里铺，属赵官屯乡）。

马定国，字子卿，茌平县人。据《金史》记载，马定国少年时就与众不同。初学写诗时，不知如何写，难以入门。有一天夜里，他梦见父亲给他一支方寸白笔，从此灵感大开，文章大进。北宋宣和年间（1119—1125）因为题诗酒家壁，有“苏、黄不作文章，童、蔡翻为社稷臣”之句，讥讽朝臣，是以得罪，亦因此马定国的名声传播四方。据《金史》载，金熙宗天眷初（南宋绍兴八年即公元1138年）马定国到济南历下游览，因作诗出名而赢得了伪齐皇帝刘豫的赏识（刘豫，北宋官员，任河北西路提刑，据济南府，金兵南下，刘豫献济南府降金，被金国封为齐国皇帝，史书称伪齐），诏授为齐国的监察御史（官名，行监察百官事）翰林文学士（即皇帝的文学侍从官）。

马定国一生专学，尤其对古文学的研究十分卓著。自唐朝以来，对石鼓文一直没有定论，（石鼓文，我国最早的刻石文字，为秦始皇统一

文字前的大篆，即籀文）马定国引据论典，以万余言进行辩证，以字划考之认为是宇文周时所造（宇文周，即南北朝时代的北周，因国姓宇文，故也叫宇文周）。（557—581年），在当时他的辩证得到了文人学士的赞同，认为可与蔡正甫的燕王墓辩相比。马定国卒年不详。据现在的研究证明，即然石鼓文为秦统一文字前的大篆，就不可能是北周所造。

《金史》记载马定国是在平人，出生之地却没有说明，那么《在平县志》所载马定国的墓地，也应是他的出生地。虽然马定国当年曾是伪齐国的大臣，但家乡的后人还是为他修墓立传，以示纪念。

注释：石鼓文，中国现存最早的刻石文字。在十块鼓形的石上，每块各刻四言诗一首，内容歌颂秦国君游猎情况。所刻书体，为秦始皇统一文字前的大篆、即籀文。

耿端义墓

原博平县贾寨乡耿家庄，在中国历史上的金朝，曾出了一位名人，叫耿端义。

据《金史》记载，耿端义，字忠嗣，博州博平人（博州，隋置，治所聊城，辖聊城、茌平、博平、高唐等地）。金世宗大定二十八年（1188年）考取进士，调滑州（古州名，治所在白马，即现在的河南滑县东，辖滑县、延津、长垣等地）任军事判官，历任洛阳县令、尚书省令史、太常博士、左司员外郎、河北东路按察副使、翰林院侍讲学士等官职。耿端义无论任县官、州官还是京中大员，勤于政事，功绩卓著，常得朝中重任和信赖。金宣宗贞佑二年（1214年），金朝中都（即现在的北京）被元军所围困，危在旦夕，城门终日紧闭，将帅无人敢出城作战。宣宗召文武百官商议退敌之计，耿端义进谏说：今日都城被围，而城中官兵又不多，出城作战退敌是不可能的，如果将城中的官兵和百姓组织起来，万众一心固守城池，也可能敌人不战自退。宣宗采纳了耿端义的建议，长时间固守不战，元军无奈，只好退去，中都遂之解围，耿端义言中而立。

了一功。

相传，耿端义告老还乡后，三个儿子各自成家立业，老大居住的地方叫耿大庄，老二居住的地方叫耿二庄，老三居住的地方叫耿三庄，即今日耿家庄的来历。据清道光年间（1821—1850）的原《博平县志》记载，耿端义的墓在城西二十五里，其地今为耿家庄。

马 周 墓

据《茌平县志》记载，城“东郭一里许有马周墓在焉；而张奎，叶天球、张寅、王靖、李秉愚诸名贤俱有诗刻石。康熙年间知县王画一重筑之。”其确切位置，在前林庄正南、冯氏河沿以北，墓建在有数亩的漫坡高地上。此墓是一假墓，或曰“衣冠冢”。“文革”中破“四旧”，此墓被毁，没有发现什么遗物。实际是后人为了敬仰马周这位本乡的名人而建的。

唐贞观之治时，因马周有奇才，得唐太宗赏识，被授于监察御史，中书侍郎，太子太傅，后迁中书令（相当于宰相之职），进银青光禄大夫卒。

《资治通鉴》《新唐书》，对马周及其疏奏都有较详细的记载。马周生于隋文帝仁寿元年（601年），少贫孤，而好学，尤其善读《诗书》、《春秋》，精通史学，具有雄才大略，胸怀理政治国之策。因不拘小节，为乡人所轻。贞观三年，马周客游长安，旅居中郎将（皇帝侍卫的统领，唐代各卫的中郎将为低级的武职）常何之家。六月，时值大旱，太宗皇帝召文武百官极言

得失。常何是个武人，不通文墨，难以对策，马周代拟二十余条计策呈太宗，太宗怀疑常何没有这样的才能，故问之，常何具实而奏，此非臣所能，是家客马周代拟。太宗即诏马周，未等马周到，太宗四次派使臣催促，马周进殿，与太宗对语，问答如流，太宗大悦，遂封马周为监察御史，视为亲近，奉使称职，常侍左右。

马周对皇帝的恩泽重用，感激不尽，决心为皇帝尽孝忠义，辅政图强，子承父业，百代不衰。马周曾多次上疏，谏谕朝政，力陈利弊，进言国家兴亡之计。他的上疏主要有以下几点：一、劝化太宗以孝道为本，因太上皇春秋已高，应“朝夕视膳”，不应把太上皇一人留在京城，而自己到离京三百里以外的“九成宫”去避暑，若太上皇或时思念，陛下何以赴之，愿示还期，“以开众惑”并要太宗亲事宗庙，以示后人不忘祖也。二、提出“致化之道，在求贤审官”。这是针对当时贪官污吏横行乡里而言。“致化之道”就是治理、统治的办法。“求贤”即选用德才兼备的人；“审官”即对官吏政绩的考核，以作贬褒，定去留。马周提出要使百姓安乐，用人是根本（指官员），刺史、县令既众，未必皆贤。当朝只重京内之官，而对刺史、县令颇轻其选，或武夫勋人、或京官不称职外任，而以德行才术提升的

人，十人里没有一个，所以百姓不安，也在于此。三、反对对宗室、功臣的分封制。马周举汉光武帝不任功臣以吏事为例，说明选官授职，必须量材而任。如若有不肖子孙袭封嗣职，百姓遭殃，国家蒙患。四、要求国家君王、大臣及宫内嫔妃，“要节俭于身、恩加于人”。罢营缮、除徭役，使百姓得息力田。少积蓄，以富民，居安乐。马周指出，自古以来，国之兴亡，朝代长短，取决于帝王是否有恩于民，使民安居乐业。如果百姓积怨，聚为盗贼，或一呼百应而起之，国家莫不亡也。要教化皇太子思禹、汤、文、武之道，体察民情，广施德化，恩结于民，太宗百年之后，皇太子定能继承圣业，朝代不废。

马周的一系列主张和建议，深得太宗的赏识，并被采纳，视为近臣，亲同手足。太宗曾说，我一时不见马周即想念他。所以太宗对马周一再加官进爵。马周患病，消渴连年，太宗寻找胜地为马周建宅地，诏膳食，请医视护，躬为调药；太子床前问疾。贞观二十二年，马周四十八岁卒。赠幽州都督（军事长官），陪葬昭陵。高宗即位，追赠尚书右仆射（官名，射音读夜，宰相职）、高唐县公。

在平县人为了敬仰和纪念这位才人贤官，就在城东造墓，立碑刻石，以教后人效其才学，利

其国家。

注释：

- 1、**监察御史**：官名，掌分察百僚，巡按郡县，纠视刑狱，肃整朝仪。
- 2、**中书侍郎**：中书省长官中书监、令之副官。
- 3、**太子太傅**：辅弼国君、太子的官。
- 4、**银青光禄大夫**：官名、唐时从三品，掌顾问应对。

鲁 仲 连 墓

鲁仲连，战国时齐国人。一生“好奇伟倜傥（洒脱，不拘束）之划策，而不肯仕宦任职”，持高节游说（音税）于各诸侯国，为人排患解纷、释难，不居功，不受赏，他的高洁情操，深为人们所赞许。这样一位人物，死于何时，葬于何地，未见其他史料有记载，据《在平县志》记载，在平县有鲁仲连墓。

民国二十四年修《在平县志》记载：鲁仲连墓在望鲁店北二里许，年久平伏；康熙二年春，知县王画一筑垄立石植以松焉，此说是沿袭前五次修志而载，鲁仲连墓在在平似可信。“望鲁店”村，过去叫王明屯，是鲁仲连故居；民间传说孟子从鲁国风尘朴朴到在平县（当时为齐国西界）拜访鲁仲连，病倒在刘集村的店里，久治不愈，只好向北眺望仲连故居，方心满意足。康熙年间在王明屯修建仲连祠，重修鲁连墓，王明屯遂改名“望鲁店”。

鲁仲连的故事，在司马迁的《史记》里作了很生动形象的描述，著名的故事有“说魏救赵义不帝秦”、“射书聊城劝燕降齐”等。

“说魏救赵”：秦军重兵四十万围困赵国都城邯郸，魏王派大将晋鄙领兵十万救赵，由于害怕秦军，魏兵在汤阴屯兵不进。魏王派客卿新垣衍将军潜入邯郸（新垣衍因是住在魏国的外国将军所以称客卿），通过平原君（赵相）转达魏王对赵王的意见，意思是说，现在齐国很削弱，秦国很强大，秦围赵都，是想称帝，只要赵国派一个使者去尊秦昭王为帝，秦国就一定撤兵，赵国也就有救了。平原君犹豫不决。当时鲁仲连正好周游到赵国，为解秦国围赵之患，大义凛然地会见了新垣衍，详细地分析了当时的动乱局势，权衡了救赵与降秦的利害关系，说服了新垣衍使其改变了主张同意救赵，秦将闻知，慌忙退兵五十里，魏公子无忌（信陵君）夺了晋鄙的兵权，统率大军救赵击秦，秦军败退，赵国得救。

为了感谢鲁仲连说魏救赵，平原君封赏千金，仲连拒而辞谢，离赵而去。

“射书聊城”：是说战国时期，燕将乐毅帅秦、晋、燕、韩等国军队联合进攻齐国，五年时间攻下齐国七十余城，归燕管辖，齐国只剩莒城、即墨两地未失。后来齐将田单大摆火牛阵，率军反攻二十余年，又收复了七十余城，当攻打到齐国西界聊城时，燕军防守甚严，闭城待援，齐军攻打一年多未克。恰逢鲁仲连到此，写了一封书

信，射入聊城城内，劝燕将降齐。鲁仲连在信中主要指出齐军日渐势大，其他城池已被攻克，你们在齐军包围之中，独守孤城，既得不到燕王的增援，又不能回国封官授禄，又无法与家人父母妻儿团圆，只有降齐，别无出路。燕将官兵读了鲁仲连的信，痛哭流涕，军心大乱，无力再战，田单趁机率军攻下聊城。

齐王对鲁仲连的功绩大加赞赏，欲封其为官辅政，仲连婉言谢绝，又到东海周游去了。后人为了敬仰这位齐国高洁的名人，为鲁仲连修祠筑墓，以使后世不忘。唐朝大诗人李白，也曾在诗中对鲁仲连的故事加以赞颂，现据《全唐诗》摘录于下：

别 鲁 颂

谁道泰山高，下却鲁连节。
谁云秦军众，摧却鲁连舌。
独立天地间，清风洒兰雪。
夫子还倜傥，攻文继前烈。
错落石上松，无为秋霜折。
赠言镂宝刀，千岁庶不灭。

五月东鲁行答汶上君。
五月梅始黄，蚕凋桑柘空。
鲁人重织作，机杼鸣帘栊。
顾余不及仕，学剑来山东。

举鞭访前途，获笑汶上翁。
下愚忽壮士，未足论穷通。
我以一箭书，能取聊城功。
终然不受赏，羞与时人同。
西归去直道，落日昏阴虹。
此去尔勿言，甘心为转蓬。

奔 亡 道 中

谈笑三军却，交游七贵疏。
仍留一支箭，未射鲁连书。

淳于髡墓

淳于髡，战国时齐国人。《史记》将其列入滑稽列传。史记中说，淳于髡高不足三尺，但却凭三寸不烂之舌，能言善辩，足智多谋，滑稽有趣，博闻强记，虽无尊位，却不卑不亢。淳于髡是何乡人氏，史记资料中无从查考，在平 县 有淳于髡墓。

据《在平县志》记载“淳于髡墓在城西二里许，叶太守天球、裘石曾学士槩（音其，官吏证明身份的一种木制牌）俱有诗。康熙二年知县王画一筑垄勒石，植以松柏；后知县吴陈琰为其立碑“淳于先生之墓”，墓址即在现在城西小刘庄前，文革中碑楼被毁坏，石碑存于小刘庄。

淳于髡的故事，主要有：“谏齐王”、“止齐伐魏”、“一朝见七士”、“见梁惠王”、“智说齐王救薛”等名篇，现举其一二。

淳于髡谏齐王，是说齐威王好淫乐，长饮酒，沉湎于色，不理朝政，乡大夫百官荒乱，诸侯互相侵并，齐国也将有灭亡的危险，左右大臣都不敢劝言。淳于髡以隐语（比喻）对齐威王说：齐国有一只大鸟，停在大王的殿堂上，三年

不飞又不鸣，大王知此是何鸟吗？大王顿悟，说此鸟不飞则已，一飞冲天；不鸣则已，一鸣惊人。于是齐威王整顿朝政，出兵征伐，诸侯震惊，皆还侵地。威王八年，楚国发大兵伐齐，齐威王令淳于髡为使者，以金千镒（重量，古时二十四两为镒）、白璧十双、车马百驷（音四，四匹马拉一辆车为驷），求得赵国精兵十万、革车千乘（音剩，古代称四匹马拉的车一辆为一乘），击楚救齐，楚兵连夜逃走。齐威王大悦，置酒后宫，宴请淳于髡大夫，论及饮酒之事，淳于髡现身说法对齐威王说，饮酒宜少不宜多，酒极则乐，乐极则悲；万事尽然，言不可极，极之而哀。齐王称善，认为淳于髡的话有道理，于是乃罢长夜之饮。

淳于髡见梁惠王的故事，是说因淳于髡能说善辩，承意观色，很有名气，好比晏婴（战国时人）。淳于髡的朋友就把他引见于梁惠王。第一次梁惠王屏左右而独坐，淳于髡不说话，第二次再见，淳于髡仍无语。梁惠王责问淳于髡的朋友，为什么淳于髡见了寡人不说话，难道大王不值得与他说话吗？朋友问其故，淳于髡说，我第一次见大王，大王在想骑马打猎的事，我第二次见大王，大王在想听颂词，所以我沉默不语。髡的朋友将其话转告梁惠王，王大吃一惊，说淳于先

生真是圣人也，第一次先生来之前是有人献来了一匹良马善驹，我还没来得及去看；第二次先生来时是有人送来了音乐颂词，还没来得及试听，虽然先生来见，然而我却想着别的事，冷待了先生。于是梁惠王即召见淳于髡，话一开头，说了三日三夜都不知疲倦，说史论政，很是投机，讲了许多治国安邦的道理。梁惠王想以丞相之位让淳于先生留下，淳于先生固谢辞去；梁惠王送以车马，锦帛加璧，金百镒为其送行。而淳于髡终身不仕。

马周墓、鲁仲连故址、淳于髡墓，其地皆列为茌平八景之一，以表茌平县人民对他们的才学 and 情操敬仰之意，并世代传颂。

在平县广平出土的唐代石造像

刘善沂

1979年5月，聊城地区文物收购站从在平县广平公社收集一件唐代弥陀石造像，转交聊城地区博物馆收藏，现将石造像介绍于后：

造像高52、宽32.9厘米。内容为弥陀说法，主佛置于束腰莲座上，佛高18.2厘米，形体瘦长，双目微合，面相端庄，身穿敞领袈裟，结跏趺坐，左足外露，右手上举，食指与拇指作环形，其余三指微伸，左手置于左腿，掌心向上，作“说法印”状，背有圆形顶光，浅刻两同心圆，同心圆之间饰一周莲花纹，外圆饰火焰纹。

莲座上为仰莲束腰处雕有托扛力士两躯，下为饰宝装覆莲。

二菩萨各高18.7厘米，均戴宝冠，端立于莲花座上，体长腰细，双足跣露，颈部饰璎珞，至胸前结成环状下垂过膝，腰束长裙，一手举莲蕾，一手提裙带，神态肃穆恭顺。

造像底座为长方形平台，正面开一长方形小龕，龕中阴刻一裸身坐式侏儒，头顶宝炉，以左手扶持，香炉两侧有一对浮雕蹲狮。铭文在小龕

两侧，共有六行三十五字：

“显庆五年四月」卅日，比丘尼行」儒敬造
弥陀像」一铺，为皇帝」师僧、父母、法界」众
生，咸同祈福。”

这是一件唐代有确切纪年的石造像，显庆五年即公元660年。铭文字体为楷书，规整秀逸。发愿文的内容是女尼行儒为皇帝、师僧、父母和法界众生祈福求祥而造像一铺。

整个造像主从有序，阴刻、浮雕、圆雕互相配合，层次分明，衣纹线条流畅，雕饰精巧清晰，显示出了初唐的雕刻艺术风格，它为我们研究佛教艺术提供了珍贵的资料。（原载《考古》83年第8期）

《孔子回轅处》石碑

在茌平县博平镇北十一里三教堂村，有一块清代石碑，正面有五个二十五公分见方的大字“孔子回轅处”，楷书阴文，上款刻有“大清乾隆十□戊□夏季吉日重立”。经核查《中国历代年表》，立此碑的确切日期应为“大清乾隆十三年“辰夏季吉日重立”。下款没有立碑者具名，可能年久损坏无法辨认。石碑的尺寸为170×67×19厘米。

为什么在这个地方立一块《孔子回轅处》的石碑呢：这是为了纪念孔子曾经到过这个地方。关于孔子到这里的经过，《史记》是这样记载的：

在春秋战国时期，孔子和弟子们周游列国，宣传仁义。在得不到卫国重用后，孔子乘车西去晋国拜见晋大夫赵简子，当他们走到漯河口时，弟子们对孔子说，听说晋大夫赵简子把窦鸣犊、舜华杀了。孔子听了后，心里很难过，他感叹地说：“浩浩荡荡的流水是很美丽的，可是我不想过去了”。弟子子贡忙问：“你这是为什么呢？”孔子说：“窦鸣犊、舜华是晋国的贤士，与赵简子是好朋友，在赵简子没有得志的时候，全依靠

他两人的帮助和支持；可是他现在掌权了，觉得自己强大了，却把老朋友给杀了，象赵简子这样不讲仁义的人我怎么能再去见他呢？我听说，如果杀死了幼小的野兽，麒麟就不会来到郊外；如果把水里的鱼都打尽了，蛟龙也不肯来繁衍了；如果毁坏了鸟窝、鸟蛋，则凤凰也就不肯到这儿来飞翔。为什么？因为都认为同类被残害是很伤心的事！鸟兽还有这样的感情，难道我就能无动于衷么？这赵简子实在是不仁义了”。从孔子的这些话里可以看出，他对赵简子杀了自己的朋友是多么愤慨。孔子一向主张仁义，他曾说过：“仁者人也，亲亲为大”。赵简子对他最亲近的人都不仁不义，所以孔子就不愿去见赵简子，就命弟子们回转车辕，回到家乡鲁国陬（邹）邑，为窦鸣犊而作《陬操》，以表哀思。

当年孔子欲渡之漯河，就是现在流经茌平县境内的徒骇河，是大禹治水疏九河之一；当年孔子欲渡河之处，后人曾叫“鸣犊口”。到了汉朝，废黜百家，独尊儒学，孔子便被奉为儒学的祖师，受到天下人尊敬，被历朝帝王和百姓奉为圣人，孔子所到之处，自然也就成了圣地，便刻石立碑，纪念孔子，以倡仁义。也许这就是“孔子回辕处”石碑的来由。

从石碑的落款“大清乾隆十三年戊辰夏季吉

日重立”一语来看，在这之前曾立过石碑，不知什么时候丢失或毁坏，所以“重立”石碑，以不忘前人遗训。前立之碑，已无从考查。

北王桥家庙刻石

在韩屯乡北王桥家庙大门左侧墙上有一块刻石，石上刻有“迎仙井榦”四个楷字，刻石左边纪年是“崇贞乙亥仲春吉”，右边字是“庙主王大便暨侄男、庄、禄、敕、立”。刻石尺寸：

(72×43×11厘米)。从文字上看，这块刻石刻于明朝崇贞八年（1635年）二月中旬（阴历）。干（罕）、榦、古时同音。“井榦”，古时指井上的栏圈，此处借用典故指楼台。《汉书·效祀志下》：“立神明台、井榦楼，高五十丈。”颜师古注：“井榦楼，积木而高，为楼若井榦之形也”。“迎仙井榦”的意思，即为供奉神仙的楼台、庙堂。（王大便“便”古时鞭、便同音）。

这块刻石的发现，为北王桥前徒骇河（黄河古道）上的一座石桥建桥时间，提供了佐证。据本村人说，庙主王大便，是一个大户人家，在当时他能自立家庙，足以说明他在本村是一个旺族之长。王家家庙上这块刻石刻着王大便及侄男们在明朝崇贞年间所立，一般来说王家家庙也应在同一时代。相传王大便有一女儿嫁与徒骇河南王庄，因其女每到本族家庙上香拜佛，过河很不方

便，王大便就在河上修了一座石桥，供女儿及乡人通行。如果将刻石、家庙、石桥联系起来看，就可以确定这座石桥也应属明代石桥（见明代石桥一文）。

迟桥“节孝”碑

在平县广平乡迟桥村有一块“节孝”碑，立在一农民家的墙壁上。（尺寸：150×80×20厘米）

此碑中间刻有“节孝”两个大楷字，每字约有二十二公分见方。碑的右边用小楷书写着“钦命山东提督学院裕×为东阿县迟巴山之妻 贺氏立”，碑左边小楷写着“光绪拾伍年岁次己丑畅月上浣穀旦”，“畅月”指阴历11月，“上浣”指本月上旬，“穀（谷）旦”指晴朗美好的日子，或意为吉日。

据本村老年人回忆，过去迟桥有很多能写一手好字的人，尤善写碑文，如本村清秀才迟凤桐专写碑文，现存有他写的节妇碑一块。其父迟清翼也写一手好字，写了许多碑文。“节孝”碑系本村迟衍更书写，此人虽没有功名，但是他十二岁便能悬肘写字，以后专为四乡百姓写碑文，远近有名，方圆几十里只要有迟衍更活着，别人没有人敢写碑文。迟桥人的字体，世代相传，非颜非柳，自成一体，刚健清秀。

冯公碑记

贾寨乡冯庄有一座碑，碑额上写着“冯公碑记”。此碑立于“明万历岁次丁未仲冬月上旬吉辰”，即明万历三十五年（1607年）阴历十一月月上旬，吉辰即吉祥的时刻。该碑是“赐进士弟吏部主事朝阳张凤翔谨纂”。原《博平县志》载，“城西三十五里有冯朝杨庄”，即现在之冯庄。

碑文为小楷字体，内容主要记录了冯庄的历史渊源。冯庄的元祖系从荏邑迁来，冯族的族长即冯公冯正容，字汝貌，同时写明了冯庄的地理四至位置。更为重要的是此碑写明了“晋台之西相去仅式舍有冯氏村……”，晋台，是战国时期晋公子重耳客居齐国，为不忘故国，就在博平筑一高台，天天登台西望故国（晋国）故名曰“望晋台。”原《博平县志》载晋台是博平八景之一，但是没有确切的地理位置，多年来无从查考，所以此碑为今后进一步查证晋台故址提供了依据。

净 居 寺 碑

张营乡北孟村，有一座净居寺碑。据本村人讲，过去村南有一座故寺遗址，文革中本村人从遗址上拉了几块碑修了坑咀子，其中一块就是净居寺碑。关于净居寺，原《博平县志》记载：“县城西北二十五里有净居寺”。碑的上头刻着六个正楷大字：“重修佛殿碑记”，碑文系小楷书写体，内容主要是记述净居寺的地理位置、佛教渊源、佛殿修缮事宜等；而重要的是，此碑也记载着净居寺与晋台的距离，碑文说“……晋台之北二十里×寺曰净居寺，盖故寺也……”，也就是说，从净居寺向南二十里就是晋台故址，如果将冯庄《冯公碑记》、《博平县志》和《净居寺碑》等联系起来加以研究，就可以确定晋台的大致位置所在。

此碑碑文由“本邑（原博平县）乡进士齐一鸿撰”，“大明万历岁次丙戌仲侣月吉旦立”，即明朝万历十四年（1586年）六月。仲侣，古代音律十二律中的第六律，仲侣月即指六月；旦，天亮、早晨；“吉旦”意即吉祥的早晨。

董 立 元 碑

董立元（1791—1841），字逢春，号云槎，杜郎口乡董庄人，董氏第八世孙。大约从第六世孙起，董家的花鸟中堂画就有了一定的水平，尤有董立元画工最著，远近闻名，并带来了他以后一百多年间董氏中堂画的繁荣时期。

董立元成年丧父，因无力办丧礼，又遇其外公赵家鄙视而出走谋生，发奋努力，定要闯出名堂来，以告慰先人之灵。他先到太原一带，边学习，边绘画，终于以工丹青善写照（像）而赢得当地百姓的喜爱和社会名流的赏识，收入渐丰，并得资助，方回乡为父出丧。后到曲阜周游绘画，得到孔府衍圣公孔庆镕的垂青，赏给他奎文阁典籍之职，兼为孔庙绘画。值衍圣公进京入觐之时，随公北上，考取内阁供事，又历任直隶署理按察司、保定府束鹿县县丞、正定府深泽县知县等，后因丁忧（母丧）回乡。因董立元绘画有一定的成就，清道光皇帝授予他“文林郎”的称号。董立元的山水、花鸟继承传统技法，线条流畅，色调鲜颜明朗；人物画选材多为神话故事，名媛淑女，画工精细，神态自若；所画人像微妙

微肖，十分逼真。董立元在世五十余年，在民间留下了许多优秀的作品。

董立元碑(25×180×80厘米)，现存于董庄，基本完好，此碑立于清光绪十六年(1890年)，由邑庠生王闻绍撰并书丹。现将碑文抄录于下：

公讳立元，字逢春，号云槎。工丹青又善写照，常往来阙里间。衍圣公孔庆镕徵为上宾，赏给奎文阁典籍，由是志切仕进。值衍圣公入觐，公随北上，考取内阁供事。咨送国史馆议叙，以县丞选用，分发直隶署理按察司，经历补授保定府束鹿县县丞，佐理循良，闾阎称颂。奉满调升正定府深泽县知县，旋以母忧卸任。此其彰彰在人耳目者也。而子所素重于公者，要不仅是夫公赋性英明，持身谨慎，语言和谐，度量恢宏。家寒不能供读，攻苦三余，父歿，克守遗言，睦和九族，善事萱堂，慕深温清，笃怀棣鄂，情叶壻簏。卜先君之窀穸，祀展椎牛，垂后嗣之箕裘，谋深翼燕；排难解纷，靖讼端于梓里，气求声应，联明友于木天处；为善士所由，出作良牧也。惜乎读礼居家，未获起官而捐馆；懿輿芳名令德，爰为摭实(拾)以诔词。

敕授文林郎董公行一偕元继配李邵孺人之墓

邑庠生姻再晚王闻绍拜撰並书丹
光绪十六年岁次庚寅暑月谷旦立石

注释：

- 1、奎文阁典籍：旧时指管理国家重要文献的职务。
- 2、入觐：朝见帝王或朝拜圣地。
- 3、萱堂：母亲的代称。
- 4、棣鄂：怀抱之意。这里指胸怀远大志向。
- 5、壎篪（音坝迟）：古代两种乐器。
- 6、窀穸：墓穴。
- 7、摭实（拾）：摭，摘取，即袭用现成的事例或词句。
- 8、谀词：上对下、贵对贱的颂词。
- 9、仕进：旧时指借做官而谋个人的发展。
- 10、署理：旧社会指某官职空缺，由别人暂时代理。
- 11、按察使司：主管地方司治刑狱和官吏考核的机构，按察使即按察使司的长官。清时隶属于各省总督、巡抚，为正三品官。
- 12、补授：候补的人得到授职叫补授，犹如补缺。
- 13、文林郎：在帝王身边掌管文翰的官。董立元授的是虚职。
- 14、母忧：即母亲去世。

冯玉祥题字碑

在茌平县博平镇（原博平县）杨庄村东北半公里处有一座石碑，碑名系著名爱国将领冯玉祥先生所题，于民国二十五年（公元一九三六年）立。后经历年，险毁于灾，幸有后人精心保管，一九八八年重立。

此碑是现居台湾的傅瑞瑗先生为其祖父母所立。碑额正面上方雕刻双龙戏珠，下方用隶书字体刻着：傅公连珠暨德配刘孺人碑。冯玉祥题（并刻有两方印章），时为民国二十五年十一月。碑额后面上方雕刻两面交叉的国民党旗，下方是碑文，碑文为河南大学文学院院长铜山萧一山撰，原博平县县长山左刘云亭敬书，小楷字体，规整遒劲，耐人寻味。碑文记述了傅瑞瑗先生为其祖父母立碑的经过及祖孙三代的生平。

该碑分碑帽、碑身、碑座三部分，高3.6米，宽0.83米，厚0.30米。

傅瑞瑗先生，号玉甫，一九〇五年生，一九一六年就读于博平西街小学，一九二四年毕业于聊城省立第三师范，同年考入北京前门内私立中国大学，后辍学从军，在冯玉祥部孙连仲炮团当

兵，故求冯玉祥先生为其祖父母题写碑名，可见傅先生对冯玉祥先生仰慕之心深矣。傅先生曾留学英国，官至国民党空军中将，现已退役休养。傅瑞瑗先生，去年回乡探亲，看到祖国改革开放的政策和家乡的巨大变化，深受感动，为扩建县图书馆，捐资一万伍千美元，并表示把在台收藏的书画赠送家乡人民，以表赤子之心。

附碑文：傅公连珠暨德配刘孺人碑

公讳连珠字子明，博邑杨庄人也。其先出自姬姓，黄帝裔孙，大繇封於傅邑以为氏焉。公受天醇素仁笃耿直，遇事敢为，有任侠风。少孤贫，及壮，佣于贾庄贾姓。时太平天国方标义帜，声势赫烜，震动宇内。某日，祝融忽降贾姓家，烈焰蔽天，莫之敢撻，公独奋不顾身，戮力扑救，燎原之祸虽戢，公竟邈乎人间，时年止而立耳。段而闻之，同为太息。德配刘孺人长公三岁，公歿时抚尸悲痛，几不欲生。转念孤子凤甲才十三岁，茕茕而立，何所怙恃，思为傅氏延一线之绪，籍慰夫君於地下。姑茹苦含辛，纺织自给。凤甲常汲水井边，孺人以绳系腰际，慎有隕坠。凤甲被执役于太平军中，孺人倚门企望，心折骨驚，比得返乃释然，综覈孺人一生，相夫教子，其所谓巾幗贤俊者邪，寿九十有六，无疾而终。子凤甲亦以孝闻。孙长瑞兴力田梓

里。次瑞瑗历充国民一军参谋等职，留英专习航空；回国后任航空学校教官及空军队长，桂馥兰芬头角峥嵘，天之报施善人信不爽矣，一山曩游欧邦，值公次孙瑞瑗於罗马，万里故吾对为欢。今乞文建碑，以昭公暨孺人之德行，谊不能辞，爰就其行状缕述所履，光示无穷，络曰：巍巍崇猗延，此良俦持躬，忠烈励节清，迺祖贻孙谋；源远流水流，身歿兴存，贤德千秋。

河南大学文学院院长铜山萧一山谨撰

博平县县长山左刘云亭敬书

男凤甲率孙瑞^兴瑗暨曾孙德^宽叩之

茌平县发现一处元代窖藏

1978年春季，茌平县肖庄王菜瓜村社员王永曾，在村西北1.5公里处挖土，发现一处窖藏。据王永曾讲，这些器物放在釉瓷瓮里，口上盖有瓷盆和陶盆。出土器物共十二件。聊城博物馆和茌平图书馆闻讯后，两次去该村征收文物，除黑釉瓷碟和青釉开片双耳瓷瓶已失外，其他分别收藏于聊城地区博物馆和茌平县图书馆，现将这些器物分述如下：

鎏金铜菩萨：1件。高8.1厘米。头戴化佛冠，宝缙垂于两肩，长披曳地，脸呈圆形，颈饰缨络，袒胸露腹，下着长裙。右臂下垂，左臂残断。跣足立于束腰莲瓣座上，下有三层圆形座台。

陶盆：1件，残。高22、口径60、底径31厘米。圆唇，敞口，深腹，平底，素面，泥质灰陶。

绿釉陶鼎：1件。高17、口径11.9厘米。方唇，沿内凹，侈口，直颈，双附耳，鼓腹，圆底，三兽形足。泥质红陶，浅绿色釉，含铝量较大。

三彩狮子莲花灯座：1件。高22.8、长25.3、宽11.2厘米。站立状、左顾首，头上卷鬃，尾向上曲卷，身披障泥曳地，背负双层莲花形盆，前

胸和臀部束带。陶质硬，呈淡红色，施赭黄、绿、白色釉，各种色斑互相浸润。

白釉瓷盘：1件，残。高4·2、口径26·1、底径16·8厘米。芒口、圆唇、浅腹、平底、圈足。内底印有暗花双鱼和藻草纹，胎质洁白坚致，施白釉。

影青瓷菩萨：1件，残。高19·4、宽9·7、厚4·5厘米。头戴冠，宝缙垂于两肩，颈饰缨络垂于胸前，肩披飘带，身穿半宽袖长衣，袒胸露腹，左臂下垂，手带贯珠之钏，右臂置于右腿前，小臂残断，半跏趺坐于座上，侧膝前塑一跪拜弟子，右足外侧立一鸟，左手外左立一物，因残断不释何物。胎质细白，釉处呈青白色。

龙泉窑瓷奩式炉：1件，高7·4、口径13·1底径10·4厘米。沿内一周宽边，直壁深腹，腹部印有八卦图案，三兽形足，底部有一圈足，底下凸。胎质坚硬呈红褐色。豆青釉。

徽州窑瓷盆：1件。高13·8、口径28·9、底径15·5厘米。圆唇、敞口、深腹、平底、圈足。器里施白釉，用赭黑色绘弘纹和草叶纹。器外沿施白釉，腹部施酱釉。

黑釉瓷罐：1件。高11·5、口径12·4、底径8厘米。圆唇、直口、短颈、斜肩附双耳、深腹、圈足。赭黑釉，釉厚下垂，腹下部露胎，胎质粗，呈黄白色。

黑釉瓷瓮：1件。高42、口径24.7、底径28厘米。圆唇、直口、短颈、圆肩、深腹，腹下十余道凸棱，平底。除唇部外，身施黑釉。胎黄白色，质粗。

上述这些同出的器物，并不属于一个时代，早至唐代，晚至元代。从用途上可分为法器和一般日常生活用具。三彩狮子莲花灯座釉色浸润感强，不象辽、金时代的三彩色彩分明，狮子背负莲花盆也是唐代佛教常用的一种装饰手法。鎏金铜菩萨的造型与兰田县水陆庵附近出土的唐代鎏金铜佛像（《考古文物》1983年1期）的风格相同，也应为唐代遗物。白釉瓷盘属定窑产品，盘中印花双鱼纹与吉林永吉县出土金代双鲤铜镜（《文物》1979年8期）的双鱼纹相似，应属宋、金时代的遗物。影青瓷菩萨与北京出土的元代影青瓷观音塑像（《记元大都出土文物》《考古》1972年11期）风格相同；龙泉窑瓷奩式炉跟朝鲜新安海底沉船中的龙泉青瓷奩式炉（《朝鲜新安海底沉船中的中国瓷器》《考古学报》1979年2期）十分相似，也应是元代遗物。其他瓷器均为元代民间瓷器。绿釉陶鼎、三彩狮子莲花灯座、鎏金铜菩萨、影青瓷菩萨和龙泉窑瓷奩式炉为宗教法器。

以上这批陶、瓷器中，三彩狮子莲花灯座和

影青瓷菩薩，造型优美可称为精品。这些器物集中在一瓷瓮里，可能是因战乱关系埋藏在地下，其埋藏年代应在元代以后。

（原载八五年《考古》第九期）

在平县郝屯出土一批金元器物

1979年春季，在平县韩屯公社郝屯大队社员在挖排水沟时，在距地表约1米深的地方，发现一批窖藏器物，内有铜器、铁器和瓷器，计31件，现分类介绍如下：

1、铜器共8件，计有权2、鉴1、镜5。

权 二件形制相同。大权高12.6、底径6.8厘米，重1695克，为覆体塔式，圆底座，方环鼻。权身两面分别阴刻铭文“□□路造”和“一”。小权高10.7、底径5.2厘米，重872克。权身两面分别阴刻“东平府依奉尚书户部造”和“至元八年云”。

鉴 高8.1、口径44.6、底径28.6厘米，器壁厚薄不匀。圆唇、宽折沿、敞口、浅腹、平底。

镜 五件。

1号镜 六出葵花镜。直径16.6、缘厚0.8厘米。桥钮、素面、宽素缘、缘部刻记“在平□□□”。

2号镜 素面圆镜。直径32、缘厚0.5厘米。半球钮，钮外二周线刻同心圆，宽素缘，缘面内凹。

3号镜 童子攀枝镜。直径13.2、缘厚0.4厘米。桥钮，圆钮座，钮座铭为阳文反体楷书“盘沟左字王家造”七字，主题纹饰为三童子俯卧攀枝戏花，同向环绕，戏嬉于花枝间，构图生动活泼。窄素缘。

4号镜 四狗镜。直径14.3厘米。缺钮，圆钮座，内区为四狗同向环绕奔跑，内外区间一周凸棱，外区铸阳文20字，字迹不清难于辨认，窄缘。

5号镜 仿汉镜。直径13.8厘米。制作粗劣，视其作风，似仿汉规矩镜。

2、铁器 共11件，计有曲颈锄2、杈2、桶提手、辘把、斧、钳、刀、臼、锅各1件。

曲颈锄 均残。长者全长81厘米。锄勾前部断面呈菱形，后端有銎，锄板残破，与现代同类铁锄形制无大差异。

杈二件形制相同，一件残破过甚。完整者杈头分三段，全长60、左右二齿各长37、间距12.5厘米。齿呈圆锥状，中间一齿短小上翘。銎长23、銎径4厘米。当是一件农具。

桶提手 全形似弓，断面呈长方形，两端卷曲成勾状，一端尚附铁制桶鼻，与之锈在一起，全长57，高21、两端间距31厘米。

辘把 全长45厘米，一端平直，一端弯曲，

底部下凸。器里外施赭，黑釉，黑釉呈放射状，外碗 二件形制相同，高7·8、口径17·3、底径7·1厘米。圆唇，敞口，深腹，圜底，圈足，端部铸成疙瘩状。

斧 身长15·5、刃宽7·5、背宽5、厚3·7厘米。斧背下4·2厘米处有一长2·3、宽1·1厘米的长方孔，与现代斧的形制无多大差异。

钳 全长25厘米，钳嘴呈喙状，后端二直柄。

刀 刀身呈长方形，柄部呈方锥状，残长22、宽10、柄长7厘米。

臼 残，仅余底部。残高7、残宽15、厚1厘米。

锅 二竖耳，残碎，无法复原。

3、瓷器 共计12件，罐2、盆2、碗2、高足杯1、碟5件。

罐 二件形制大小相同，一件口部残缺。高22·5、口径16·1、腹径24·4、底径10·9厘米。圆唇，直口，短颈，圆肩，深腹，圈足。器里外均施白釉，器外用赭黑色绘花纹。

盆 二件形制大小相同。高12·1、口径29、底径15·7厘米。圆唇，厚边，侈口，深腹，平底圈足。器外上部施白釉，下部施黑釉。

以上四件罐、盆视其作风为元代磁洲窑产品。

釉厚下垂。圈足露胎，质粗。呈黄白色。

高足杯，通高8.3，口径10.9、腹深4.6、足高3.2厘米。圆唇，卷沿，侈口，深腹，高柄圈足。釉、胎呈白色。

碟 分二式，均属“龙泉”窑产品。

I式：4件，大小相同。高3.1、口径13.2、底径5.9厘米。圆唇，宽边，浅腹，圈足。豆绿釉，底、圈足露胎，腹外划11—74莲瓣纹，内外布满冰裂纹。胎质粗，呈红褐色。

II式：1件。高3.2、口径12.2、底径5.2厘米。形制与I式相同，只是底部下凸。圈足部露胎，淡青釉，无纹饰，胎质粗，呈灰白色。

4、结语

以上这批窖藏器物有铜器、铁器和瓷器，从用途可分为农业生产工具、手工业工具和生活用具。多数器物带有明显的时代特征。其中一件铜权有着明确的纪年铭文：“至元八年”即公元1271年，应为元初遗物。几面铜镜，除四狗镜的纹饰特点、大小与河北磁县南开河元代木船中的铜镜一致外，其他铜镜在时代上要比元代早。象六出葵花镜，童子攀枝镜和仿汉镜的特点应为金代镜。六出葵花镜的缘部篆刻官府验记和押记，这是金代铜镜一个重要特征。童子攀枝镜形制和铸出钮座铭：“盘沟左字王家造”与吉林省前郭

罗斯蒙古族自治县辽、金时代的塔虎城出土铜镜一样，汉唐宋铜镜的许多类型，在金代都有仿制。仿汉镜与《阿城出土铜镜》一文公布的仿汉镜风格相同。铁器中的锄、斧和磁洲窖系的罐、盆以及龙泉窖系的青釉瓷盘，在元代木船上也有同类的器物。从这批器物的特征看，年代不会晚于元代木船的年代。

这批遗物的出土集中，显然是有意埋藏的。埋藏的原因，可能与当时的战乱有关。

原载《考古》一九八六年第八期。

抗日英雄村张家楼

在鲁西北平原上，有一闻名的抗日英雄村在平陆县广平乡张家楼。

一九三九年，日本侵略军侵入鲁西北平原，占领了平陆县，四处构筑据点，把距县城西南二十多里处黄河故道上的张家楼紧紧围在当中。张家楼是三百多户人家的大村，一九三九年我党领导这个村的群众建立了民兵组织，一九四三年成立了民兵联防队。

一九四四年农历十二月六日（阳历一九四五年一月十九日）日本侵略军、伪军集结了近三千余人的兵力，四面包围了张家楼。张家楼的民兵和群众把几十门“将军炮”、六十多支“大台杆”和土枪、钢枪顺着围墙排成一圈，呼喊着重天撼地的口号，连续打退了敌人的三次冲击。敌人用谷草燃起无数火把蜂拥而上，妄图烧毁土围外的鹿柴，煞时，围墙上的“将军炮”齐声怒吼，宛如群龙吐火，打得敌人焦头烂额，狼狈不堪。敌人火攻不成，又集中了四十多挺重机枪，把张家楼的围墙打去半截子。战斗从早晨一直打到黄昏，最后我增援部队赶到，日军死伤二百五

十余人，仓惶逃遁。

敌人惨遭失败，日本侵略军头子井上顾问暴跳如雷，便又纠集了济南、聊城、临清等地日、伪军一千二百多人，由县伪军旅长李岐山指挥，于一九四五年农历二月十六日至十八日（阳历三月二十九日至三月三十一日），再次包围了张家楼。张家楼的民兵和群众与敌人激战两昼夜，牢牢地守住了村子。第三天，敌人又从临清调来了大炮，轰开了张家楼北门，民兵立即同日、伪军展开激烈巷战，掩护群众突出重围。这次战斗，张家楼有三百三十二名优秀儿女壮烈牺牲，二百七十一人负伤。但是英雄的张家楼人民没有被穷凶极恶的敌人所吓倒，后来又配合县大队顽强战斗，赢得了抗日的最后胜利。

为了纪念这一战斗和悼念死难烈士，经省人民政府批准，在平县革命委员会于一九七一年修建了张家楼“人民英雄纪念碑”和烈士陵园，并在激战之地树立了“张家楼抗日遗址”碑，属于省级革命纪念地。

“六、二七”惨案纪念碑

“六、二七”惨案纪念碑，座落在在平县韩集乡张会所村南一公里处。

“六、二七”惨案的经过：一九四四年农历六月二十七日（阳历八月十五日），日本侵略军和伪军扫荡在平的抗日根据地，妄图把这纵横八十里的抗日根据地的军民，用铁壁合围的方式一网打尽。这天的拂晓，日军和伪军约九千余人，分路夹攻，南从聊城东界西太平庄，北从博平、在平（广平、乐平铺一带），西从聊城县东朱庄，东从东阿县牛角店，四面围攻解放区，密集的枪声吞没了大地。根据地的人民只好从四面八方方向张会所庄挤来。合围圈越来越小了，这时好多青年，随从聊城县大队，以顽强斗争的精神，冒着敌人强烈的炮火，杀出一条血路冲出火网，但其余的群众，曾几次突围没冲出敌人的合围圈。枪声刚停止后，日本侵略军便在张会所村南空旷地上开始了残酷的大屠杀。敌人首先把青壮年捆连在一起，野蛮地拷打威逼，问谁是八路军？谁是共产党？谁是联防队员？不说就用刺刀刺死。英雄的中华儿女在日本侵略军的残暴威逼下，顽

强不屈，宁可牺牲自己的生命，也不暴露谁是共产党员，谁是联防队员。

后来，日伪军又把所有的群众排成队，挨个刺杀。这时共产党员杨先民同志、刘英才同志大喊一声：“大家快跑”！青壮年和部分群众在敌人机枪乱射中，突破了敌人的包围，转危为安。

在这次惨案中，一百三十四名中华儿女，在敌人的屠刀下壮烈牺牲。但是，他们没有向敌人屈服，保持了中华民族英雄儿女的崇高气节。惨案过后，在平县抗日政府，对死难烈士的家属进行了慰问和救济，对受伤的群众一律送医院免费医疗，并在惨案地址建立了“六、二七”惨案纪念碑，以永远悼念死难同胞。

“六、二七”惨案碑文如下：

碑亭南面门上：六二七惨案纪念碑

碑南面额 ：千古永念忠魂

楹 联 ：沉痛的怀念着殉难的祖国儿女

 忆想起奠定了消灭那凶狞日寇。

正文：我们忘不了凶恶日寇的影子，在今年六月二十七日，敌人扫荡凶焰燃烧着，在南平原曾多次暴动，没有突出敌人合击圈的一百三十四名祖国儿女在敌人的机枪乱射中与世长辞了。这

样血海深仇，荏苒人民永远不会忘记。你们为了不低首屈服敌人，保持了中华儿女的伟大民族精神，保持了祖国的崇高气节，可是敌人凶焰快到尽头了。同胞们安息吧！

王信斋 撰

吴晓光 书

碑的北面额：英风虽死犹生

楹联：百卅四口祖国儿女遭倭寇残暴
屠杀

六、二七日吾辈后生怎能忘血
海深仇

正文：中华民国三十三年七月纪念
六、二七惨案纪念碑

徐效参题额

碑的东面：你们为了民族自卫战争而牺牲
的伟大精神，永远刻在我们的心头。同胞们，安
息吧！一定给你们报仇！

徐效参

碑的西面：同胞们：六、二七是你们发出
最后凄厉吼声的一天，我们时刻沉痛的怀念着

华川

“孟尝君”抗战烈士纪念碑

抗日战争时期，迟桥、大白庄一带是在南抗日根据地，这里的人民群众为抗日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一九四一年春，日伪军联合向我在南抗日根据地发起疯狂的进攻，妄图占领我根据地后继续向南推进，目的是想占领黄河以北广大地区。为了粉碎敌人的阴谋，我军分区独立团对进犯到孟尝君庙的伪顽司令齐子修部队以沉重的打击。齐子修又派伪旅长齐云泽率兵五百从西北、西面两个方向进占孟尝君庙。我军分区刘致远司令员亲率主力团从赵牛河迂迴包围了孟尝君庙，敌人向我们发起了三次猛烈进攻，战斗甚烈，都被我分区二营战士用手榴弹打退了。战斗从早晨打到半上午。我军七团二营又从耿庄飞驰前来增援，联合向敌人进行反攻，敌人丢下大批尸体和武器，大败北逃。我军取得孟尝君战斗的胜利后，七月二十五日，我鲁西大军区教导三旅奉命来在攻打伪顽薄光三在我在南根据地安设的小马庄、大吴等据点。在七团团团长刘正的指挥下，我七团在大吴战斗中，打了个大胜仗，歼敌一个团，得枪数百支，从而巩固了在南抗日根据地。

在孟尝君、大吴庄两个战斗中，我军牺牲的同志都安葬在孟尝君庙的高地上。

为了纪念抗日牺牲的革命烈士，一九四四年，在平县抗日政府在安葬烈士的墓地上修建了“抗战烈士纪念碑”。

碑的正文是：碧血犹腥，抗战烈士纪念碑
在平县抗战军、政、民各界鞠躬
中华民国三十三年纪念

对联是：安息吧，你们一腔热血洒遍了在山永固；前进着！继续六年奋斗唱出那碧水不朽。

孟尝君是战国时的名人，曾任齐国的宰相，智勇双全，食客三千，称为古今豪士。清朝在此修建了二孟庙，合祀孟子和孟尝君。抗日战争时将牺牲的革命烈士葬在这庙的高地上并立了碑，以后人们就叫“孟尝君”抗战烈士纪念碑。

四十余年已经过去，但在平县的人民永远不会忘记为抗日牺牲的烈士。每逢清明佳节，县、乡、党政机关干部、青少年学生和当地群众成群结队带着花圈、花束到“孟尝君”烈士纪念碑前祭扫致哀。抗战烈士的英名，永远活在人民的心中。

赵洪光革命烈士纪念碑

在平县韩集乡东北十里处有个赵庄，是抗日革命烈士赵洪光同志的故乡。赵氏始祖赵允于明洪武年间从山西洪洞县大槐树底下迁来立村为赵庄。这一带是革命老根据地，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涌现出很多革命战士和革命干部，不少青壮年为革命献出了生命。赵洪光同志就是其中的一个。

赵洪光同志一九四〇年参加抗日战争，一九四一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他积极工作，对敌斗争顽强，为抗日救国做出了很大贡献，因此被选为抗日政府第五区副区长。一九四三年，赵洪光同志带领区队几名战士到大徐庄征收公粮时，与扫荡的伪军相遇，在战斗中壮烈牺牲。

在平县抗日政府和根据地的群众，满怀悲愤和沉痛的心情，在赵庄村外举行安葬烈士追悼大会。为烈士英名传留后世，立碑题词。

碑文题词是：

英勇的赵洪光同志：

你为了坚持在平抗战，为了保卫人类和平，于民国三十二年十一月九日，你在大徐庄流尽了

最后一滴血，你永久的安息吧！

我们要踏着你的血迹前进，杀尽一切敌人，
一定完成你未竟的伟大革命事业。

光 荣 殉 国

在平抗日政府全体同志敬礼

中华民国三十三年四月立

太平桥与万人坑

“万人坑”在茌平县冯官屯镇范庄东南处，是太平天国北伐军殉难处，茌平县志有记载。

1853年5月6日，林凤祥、李开芳率军二万余人自扬州出发，偏师北伐，直捣燕京（北京）。北伐军一路奋战，势如破竹，连克数十城，10月进占深州，逼近北京。咸丰皇帝惊恐万状，打算逃亡热河行宫。由于时值隆冬天气，北伐军粮衣尽缺，不得不于1854年2月南撤。天京派出的援军，不幸在山东临清失败。1855年3月林凤祥在河北连镇受伤被俘，押到北京惨遭杀害。李开芳率北伐军自山东高唐南下，至茌平县冯官屯安营扎寨，凭坚固的寨墙与清军作战。

清政府为了消灭这支北伐军，即派清军将领僧格林沁，率大军追随北伐军至冯官屯，围攻太平军，太平军以少胜多，连败清军，清军“官兵勇八千余人”阵亡，锐气受挫。

僧格林沁欲战不能取胜，就开挖河沟，自聊城三孔桥起，引运河水至冯官屯，迫百姓车水入寨，水淹冯官屯。清军又用炮火袭击太平军粮库，至使屯内水患为灾，粮草将绝，困不可支。

太平军为了摆脱困境，就想出了一条“诈降计”，李开芳向清军提出，如果能放义军全军将士一条生路，他本人可以向清军“投降”；并和部下商议好，等义军将领被放出后，即刻向清军进攻，实行里应外合，打败僧格林沁。清军答应了义军的条件，但狡猾的僧格林沁诡计多端，他并不履行诺言，放一个太平军将士就捉一个，把五百余人全部捉获后，就在范庄全部杀害，埋入一个大坑内，后人称“万人坑”，以怀念殉难的太平军将士。李开芳不知出去的将士被擒遇害，他“诈降”后亦被清军所俘，解往北京就义。至此，这支北伐的太平军全军覆没。

后人在太平军“诈降”出寨的河沟上，架起了一座桥，取名叫“太平桥”。以纪念太平军的全体将士。

义和拳与五里庄

五里庄位于茌平镇东南五里处，是茌平县义和拳（义和团的前身）的发祥地、义和拳第二首领刘太清的家乡，也是义和拳首领朱红灯被捕的地方。

1899年，朱红灯由长清县来到茌平，联合刘太清，以五里庄为中心，发动民众设拳厂（亦称坛口、坛厂，是义和拳的基层组织），传习拳棒和武术，进行反清灭洋的秘密活动，当时只有“八百六十个庄的茌平县，拳厂竟达八百多处”（《中国近代史》职工读本）。此后，义和团由山东发展到河北、山西、河南、内蒙、及东北各省，形成了一股反帝、反封建的农民主力军，是近代中国人民革命斗争史上中国人民伟大胜利的奠基石之一。

1899年11月，朱红灯于岗子李、森罗殿给清军以重大打击之后，撤至茌平县境内陈沙窝一带，欲重整旗鼓。这时义和拳内部发生了矛盾，朱红灯在华岩寺（华岩寺原址现在的温陈乡华寺杨村）集上进行调停时，不幸被发生冲突的自己人误伤，就在陈沙窝调养；清军统领马金叙率马

军包围了陈沙窝，企图俘获朱红灯，朱红灯发觉后只身躲避于五里庄刘太清处。11月11日，马金叙又率军包围了五里庄，朱红灯乔装突围时，被叛民陈二狗认出，不幸被捕，十二月二十四日，朱红灯与本明（心诚）和尚在济南被巡抚毓贤杀害。

荏平八景

据各地文史资料及有关文章记载，我国各地旧志中都有当地胜景，且都是八景（少数地方十景），各景名称又都是由四言组成，这为何人所创，已不可考。不管当时各地八景之景观如何，其目的都是为了宣扬本地的自然景色，名人轶事，以引发人民群众的爱乡之情。

荏平县为秦置县，距今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随着黄河古道的不断变迁，县城也随之更址，虽几经苍桑，然而在荏平县仍是阜广物丰，地灵人杰，胜景遍布。据旧志记载，荏平县也有“八大景”，并有本地学者名人颂扬八景的文章、诗词，现整理于下。

一、圣庠灵槐

荏平八景第一景是圣庠（音武，廊子）灵槐。古时人们为尊崇孔圣人，各地都建有文庙，庙内大殿里供奉孔子塑象。荏平县的文庙（后称邑学宫）旧址在现在的粮食局院内。当时文庙建有大成殿和东西廊房，殿内有孔子塑象，两排廊房有七十二圣贤弟子的牌位，其排列模仿曲阜孔庙的样式。旧志说，在“大成殿前有槐名灵，枝柯盘

旋，其形如龙，覆盖其上，时有紫云，每逢天阴，能见其形。”清翰林、邑人王曰高在“灵槐篇”中写道：“……古槐枝干魁梧，可荫亩许，相传百年植也。……古槐生颇奇，铁干铜肤藏风雷；地亦为之不能动，山亦为之不能摧，养成大器充榑柱……”（见“茌平县志”）。把“圣庠灵槐”定为八景之一，实是为了纪念孔子而已。前人有诗颂之，录之于下：

（一） 韩三泰

莘寄仙源亲化雨，南柯旧梦复凄清。
秦松汉柏今何处，惟有灵槐百感生。

（二） 张存素

双桧旧传栽阙里，灵槐此地复峥嵘。
也应号作音声树，长伴空堂丝竹清。

（三） 周之祯

圣庠有灵槐，环护大成殿。
倘逢司马公，生意应称羨。

（四） 孙朝栋

教化无偏私，树犹有区别。
绿荫栽培深，岂止清炎热。

二、孟馆清风

旧志说，“孟馆在东郭，以孟子至齐梁时至此，后人立馆，故名。”还说：“东郭门外孟子驻处，清风徐来时，在盛暑驻足，当之醒人心

绪，飒飒而来其知所与。”旧县志只说孟馆在城东门外，其详址不清。据旧志所记可知，此馆是因为孟子曾到过此地而建，实际上春秋时在平县城址不在这里，孟子是否真的到过这里，有待进一步考证。因为孟子是孔门的大弟子，人们称之为“亚圣”，孔孟学说在我国文化思想史上有其重要的贡献，成为封建社会的理论基础，某些方面对我国的民族文化、社会发展起到过一定的进步作用。后人立馆纪念孟子，也是不无道理的。

(一) 崔迪吉

清风开孟馆，丽日照在阳；
再睹希贤貌，重登亚圣堂。
千秋八牖在，半壁一窗凉；
泰岳严严立，岁时举禴尝。

(二) 孙朝栋

驱车齐梁道，馆杰长送迎。
来此一驻足，高风永穆清。

(三) 张存素

游梁车辙此曾经，风物高寒旧馆亭。
遥指岱宗云树外，严严气象半天青。

三、连村烟市

所谓“连村烟市”，是指战国高士鲁仲连故址有若海市蜃楼之景。据旧志记载：“城之东北望鲁店前仲连故址，村落连绵，遇雾溟濛，隐有

人烟，海市蜃楼，望之俨然”。“鲁仲连墓在望鲁店北二里许……”。望鲁店，在平县村名，据传因孟子当年访鲁仲连而得名，当地人一向认为鲁仲连是在平人，清康熙年间知县王画一等人立碑修墓，重修鲁仲连祠。鲁仲连，战国时代齐国名人，善于排难解纷，出谋划策；而一生辞不为官，持节漫游，四海为家。“义不帝秦”、“说魏救赵”、“射书聊城”、“千金不受”等鲁仲连的故事均有史书记载。在平县之有望鲁店村“连村烟市”之景，使鲁仲连其人其事历代相传于人民群众之中，所以前人留下诗篇以赞其景。

(一)

李白

齐有倜傥生，鲁连特高妙。
明月出海底，一朝开光耀。
却秦振英声，后世仰末照。
意轻千金赠，顾向平原笑。
吾亦澹荡人，拂衣可同调。

(二)

王曰高

披榛迷广路，驻马拜荒丘。
战国一高士，在山万古留。
尺书服燕将，大义著宗周。
馀憾天曾醉，临风咽未休。

(三)

张 愚

东国有高士，芳宗万古传。

利名总弗计，义节独昭然。
数语却秦帝，一书解危难。
飘飘身世外，长啸海云天。

(四) 张存素

旧碣荒祠临海市，又从烟市认遗庄。
分明会得先生意，名利区区付杳茫。

四、髡林夕照

《二十四史·滑稽列传》对齐国人淳于髡有十分形象的描述。说他高不足三尺，其貌不扬，然而却能言善辩、唇枪舌剑、足智多谋、谏讽刺政、滑稽有趣。齐威王好淫乐不理朝政，百官荒乱，诸侯并侵，国将危乱，左右莫敢谏。淳于髡以大鸟喻之使威王醒悟，利国强兵，诸侯皆警，还其侵地。楚发大兵伐齐，髡借赵精兵十万，使楚惧退。“智说齐王救薛”、“止齐伐魏”等足以证明了淳于髡的智谋与雄略。据《茌平县志》记载，城西二里许有淳于髡墓（现在的小刘庄前），此墓筑于何时，无从考究。清康熙二年知县王画一筑垆勒石，植以松柏；后知县吴陈琰书以墓碑“淳于先生之墓”。因此，以“髡林夕照”之名为茌平八景之一。旧志说：“城西里许，淳于墓间，古木森疏，相间参参，夕阳返照，树影流丹，驻足望之，蔚然奇观。”并有诗赞其景曰。

(一) 路遵正

平生三寸舌，亘古一荒丘。
霞影回残照，树红疑锦旒。
草深迷断碣，客过指平畴。
常伴穰田者，夜台笑不休。

(二) 张存素

滑稽埋骨寄他乡，三尺孤坟万树杨。
犹有耕夫荒垄侧，豚蹄盍饭祝斜阳。

(三) 孙朝栋

辩士陇何高，长林斜阳远，
常存济溺心，桑榆亦非晚。

五、马庄春雨

马庄春雨，因为马庄是马周出生之地而名。唐史记载，马周是在平人，唐太宗时的中书令（相当于宰相之职）太子太傅。马周少时孤贫，后客居长安，因代常何草陈二十条而得太宗召见，遂封监察御史，常侍皇帝左右，谏言议政，尽得赏识，屡进加封，直至吏部尚书、银青光禄大夫。马周病时，皇帝亲为调药，太子问疾，卒年四十八岁，赠幽州都督，陪葬昭陵。高宗即位后追赠尚书右仆射。大臣死后在皇帝墓旁安葬，这是一种很高的荣誉。据旧志记载，县城东一里许有马周墓（现已无存）。此墓实是一座假墓，或许是衣冠冢（冢，音中，古坟）。在平县之所以有“马庄春雨”之景和“马周墓”，都是

当地人们对本县名人贤达的怀念和崇拜，并喻以对家乡的爱恋之情。旧志对“马庄春雨”之景这样写道：“城东十里马周居处，村庄之内有地亩许，三春虽暖，零露如珠，宛似江南，毛风细雨。”志中所载赞美“马庄春雨”之景的诗歌，通过人们的怀古之情歌颂了马周的功德和事迹。现录几首于下。

(一) 李金枝

苍苍云树荫在阿，中令村前策马过。
经济无端逢帝子，功名有分遇常何。
万言章奏成灰烬，一代侠风附酒波。
人道连村烟市古，马庄谁识暮烟多。

(二) 张存素

疏篱密树共回环，雾雨空濛半掩关。
一代贤良膏泽溥，尚留馀迹在人间。

(三) 张寅

周闢重丘地，唐开御史坟。
股肱宁有迹，鸾凤自离群。
飞白恩尤在，仓皇礼数分。
功名瞻异代，特出向朝曛。

六、梁原霁雪

“梁”指元朝时在平县乡宦梁宜，字醜斋，一字彦仲，生而颖异，二十四岁中解元，殿试中进士，知邳州知州，他从官期间，修堤防水，开

荒植桑业绩可考，官至河南总管、拜礼部尚书，著有《五经疑问》、《大学序解》等书。旧县志说，梁宜墓在城东北隔一里许（今墓已无存）。每当隆冬有雪，凝结积至春深，不消不灭，夜尽更深，可以映月。当时的“霁雪”景象实是引人入胜，名人学者写诗以赞其景：

（一） 孙朝栋

平原雪初霁，风景画图看。
帽影鞭丝里，仿佛增暮寒。

（二） 韩三泰

佳城郁郁古梁原，雪霁风光别一番。
可有诗家沽酒处，行人遥指杏花村。

（三） 夏大桂

银沙散漫四围平，云破隙光渐渐生。
欲霁余寒凝小院，乍暄流影淡孤城。
汲泉处处炊珠米，扫径家家碾玉声。
寂寞袁生须起卧，移榻曙色喜重明。

七、草堂书声

《县志》说：“马氏夜读学宫之东，人烟已渺，遗址亦空，每逢夜半隐然闻声，驻足听之，宛如冬烘。”马氏指金朝翰林马定国，学宫是过去的文庙，是供奉孔圣人的地方，后改学宫。上面一段文字是说，马定国曾在学宫之东读书，人虽然走了，人烟已渺茫，遗址空空如也，然而每

逢夜半仍闻有读书声。虽说有些虚言，但说明了马定国当时读书时的勤奋精神。马定国，字子卿，茌平乡贤，金天会年间人。旧志中说，马定国少年时学诗不入门，夜抄其父与方寸白笔，从而文章大进，在酒家题诗于壁，名声大震。后在伪齐皇帝刘予朝里任监察御史，仕至翰林学士卒。马定国学识渊博，一生著有《石鼓辨》、《春秋传》、《六经考》、《草堂集》、《大戴礼辨》等书，使后人倍加敬佩，并以“草堂书声”之景，以彰扬马定国的治学精神，鼓励后人勤奋读书，现有前人颂“草堂书声”景色的诗录于下：

(一) 韩三泰

开卷从来真有益，草堂况是圣人居。
每闻弦诵心如洗，沉愧当年少读书。

(二) 孙朝栋

皓月泻梧桐，清风梳杨柳。
昔闻占毕声，草堂今何有。

(三) 张存素

一编风雨古今情，遗韵虽存故址倾。
待我鸠工开学舍，霜天明月课书声。

(四) 张奎

数椽茅屋自清幽，回隔红尘十二楼。
偏好师儒时讲读，最宜士子日藏修。
碧梧翠竹翥堂夜，明月清风泮水秋。

一派咿唔声撒耳，书生功业慕伊周。

（簧：音虹，古代的学校。）

八、荏沿酒泉

据县志记载：“荏山之沿，并有香泉，汲之酿酒，酒气自然。虽在丁块（音馈），亦如井泉；丁块名酒，本此来源。”意思是说，用荏山旁边井里的泉水酿酒，酒气甘醇；丁块向皇帝进贡的名酒所用之水和荏沿井水是同一源泉。清翰林王曰高在其诗序里还说：“荏山上有古泉三眼，今存其一，用以酿酒，香冽异常。”这说明荏平县人民在很早以前就已重视利用优质泉水酿酒了，故设此景，以诗颂之，以引起人们的重视和爱护。

（一） 王曰高

甘泉自昔羨如渑，今得荏巔胜事增。
饶有中山千日醉，讵疑北壑万层冰。
主人兴尽留髡后，从事名高丁块陵。
白堕何劳终日驾，桔皮狂叟应重登。

（二） 孙朝栋

天恩醞醞渥，醴泉泻芳洁。
常愁人不醒，谁谓泉斯竭。

（三） 张存素

清风细雨杏花天，新买芳醪近荏巔。
得似济南风景否，青帘垂柳杜康泉。

(四) 韩三泰

丛尔荏山石一拳，井清可汲本天然。
生平亦有汝阳癖，竟得移封向酒泉。

(五) 傅学元

昔日汝阳望酒泉，酒泉今日徙荏巔。
香甘不减金盘露，清冽疑分玉井莲。
人杰绚思涌瑞醴，吏良浓化浹重渊。
几时散步东山上，烂醉高歌赋百篇。

博 平 八 景

我县博平镇原为博平县，春秋战国时曰 鮒陵，博陵，汉置博平县。1956年并入茌平县。现据《博平县志》录博平八景如下。

一、犊河圣迹

犊河，春秋时期称 漯河，即今县境内的老徒骇河，是大禹治水九疏之一。“犊”，是取“寗鸣犊”后一字；“圣迹”是说孔子曾经到过这个地方。周敬王廿八年（—492年），孔子不得用于卫，带弟子将西去晋见赵简子。当孔子来到漯河的一个渡口准备过河，听弟子们说赵简子把寗鸣犊、舜华两个贤大夫杀死时，心里非常难过，决定不去晋国了，回车辕还息乎陬（邹）乡，作《陬操》以哀之（详见“孔子回辕处”一文）。后人为了纪念孔子，在其地立碑刻石，名曰“孔子回辕处”，作为纪念圣地。这段漯河，取名曰“鸣犊河”，此渡口名曰“鸣犊口”；又将此地定为原博平县的八景之一，名曰“犊河圣迹”。自此以后，许多名人骚客著文赋诗，以颂圣事，传于后人，永志不忘。

现将旧县志载颂“犊河圣迹”的诗摘录于下。

(一) 窦桂馥

晴空碧影接天浮，绿水洋洋阻圣游。
韵飘风随岸转，欢声翻浪绕河流。
柳边难挽归来意，津畔空余烟树秋。
自是千年留辙迹，滔滔一望使人愁。

(二) 王功成

乘桴尚拟海天浮，何事临河阻晋游。
负轶三言终汗漫，息陬一掺转风流。
圣人瑞惜麟和凤，王者香留春与秋。
谁向河滨寻辙迹，滔滔一任古今愁。

二、灵址朝烟

灵址，即古灵县城的故址，今博平镇东北约四十里的南镇，历史上曾属博平县，现属高唐县。《博平县志》记载，东汉光武元年置灵县，后并于博平县。东汉永元九年又分置灵县。北齐天保元年，又把灵县并入博平县。隋文帝开皇六年又析置灵县；隋炀帝大业三年又将灵县并入博平县。唐高祖武德三年，又将灵县改名灵泉县，武德四年又并入博平县。唐太宗贞观十七年把博平县并入聊城县。唐中宗嗣圣八年，复析置清平县。五代十国，后唐庄宗同光二年，灵泉城改名为明灵寨。宋神宗熙宁二年，析明灵寨隶属于清平县，从以上资料说明，历史虽几经变迁，古灵县确有无疑。据《博平县志》记载，灵城故址

上每朝烟凝聚时，遥望空濛缥缈中，宛然一城郭，好事者趋而即之，渐近则没矣，盖古昔佳气之所鍾，识者咸以为灵烟云。故此，以古灵县城旧址为博平八景之一，以不忘灵城古老之渊源。邑令杨祖宪有诗赞曰：

朝来携手上灵城，城郭依稀望不清。
一幅画图空是色，九霄烟雾暗还明。
微风摇曳楼台影，旭日瞳眈鸡犬声。
郁郁纷纷何所似，路人遥指海云生。

三、莲池秋月

“莲池秋月”，是博平八景之一。《博平县志》载：“池在县东北隅，东傍城阿，西据宫墙，北枕射圃，南浸钟楼，方广数亩，水泽不竭，昔人曾种莲于其内，花开时清芬袭人，夏秋水溢潏潏空明，每朝夕童冠相携，游息其上，依稀沂水之趣，盖学宫之胜概也”。此景址即现在博平镇粮所院内。据考证，博平县城建于北宋景佑年间，系从旧址迁来，累年营造，周围多有坑洼之地，城东靠近徒骇河，水源充足，群众遂以养藕，夏秋叶壮莲开，景致十分壮观，其藕清白，鲜嫩、无滓，并作为向皇帝进贡的的佳品。莲池秋月的独特景色，使人们为之赏悦，成为博平八景之一，有兴者赋诗以赞之。

(一) 廖赓融

幽潭近绕宫墙外，香透真成君子花。
沉碧寒涵秋气早，长空晴印月光斜。
人悲浩劫归余烬，我信文章自有家。
好景从来同逝水，何如笔底吐英华。

(二) 王吉人

空明潋滟望中收，绿水红蕖景自幽。
谁把丹青留粉壁，池边弄月昔风流。

(三) 窦桂馥

数亩方塘通泮水，芹英遥傍芙蓉花。
金风起处飘香远，玉魄昇时碧影斜。
好景千年余细草，科名一鲜属谁家。
无端运会随人转，何必殷勤羨物华。

四、东渠蜃汇

东渠蜃汇，按旧博平县志记载，其原址大概在陈铺以西、金家洼以东一带，古七里河之东畔。明嘉靖壬子年秋，河水东决，积水成泽，浩漾宏深，遇旱不竭，每逢早晨遇有轻烟薄雾，泽中隐约村落、楼阁、人物等，南北绵亘二三里，人们遥观久之，日高二三丈景即逝去，人们比喻如东海蓬莱海市蜃楼一般，因此曰“东渠蜃汇”，这种在陆地平原出现的胜景奇观，的确引起了当地人们的兴趣，因此有人赋诗颂之，现据《旧志》录之于下：

(一) 堵 巍

百丈澄潭倒列星，滢洄波影碧泠泠。
不知雉鹊曾入水，颇见楼台若有形。
千顷云烟翻曙色，一溪罗縠扫空青。
人间幻化非奇事，独立苍苍对晚汀。

(二) 李金枝

空中起楼台，仿佛在尺咫；
宁须海上游，方得看海市。

(三) 杨祖宪

海市由来出海中，谁知楼阁耸渠东。
每逢薄雾轻烟际，共讶瑶台玉宇同。
只为吹嘘恁唇气，有时离合任仙风。
蓬莱本在人间世，变幻何须问化工。

五、禹堤春树

禹堤，即大禹治水疏河所筑之堤。《行水金鉴》记述：“禹治漯川，东北至千乘（利津）入海。”据《博平县志》所载，禹堤在漯河，古博平县城（博陵）以西。《山东通志、东昌府河川》条载：“古漯川，黄河支流也，俗名大土河，亦曰徒骇河故道”。《东昌府志·卷二·山水》载：“徒骇河、鸣犊河、漯水三名，其（实）一道”。西汉以后黄河决口东流均经漯河入海，几经淤塞。禹堤有一渡口，即今郭堤口村一带。据《博平县志》记载，禹堤蜿蜒迤邐、连环绵远，堤上古树阴森，每逢春雨溟濛，烟雾无际，倏忽

云敛，四望村落，炊烟万缕，其景壮观，游其上者皆为大禹治水之功业所感叹，是为“禹堤春树”之景，常以诗文赞扬大禹治水之壮举，以让后人不忘前人之业绩。有诗为证：

(一) 王吉人

负薪键竹苦填沙，壁马徒烦汉使槎。
独有金堤留禹迹，绿杨树里万人家。

(二) 李金枝

人家傍堤稠，白云自来去。
大堤千里长，明德掩高树。

(三) 任克溥

绵亘长堤一带通，相传神禹旧施工。
止知疏凿地平旷，岂更堤防天堑雄。
树色依微烟雨里，水光掩映画图中。
时人未识随刊远，疑是恁空驾玉虹。

六、晋台晚照

春秋时，晋公子重耳被逐，从翟居住十二年后又到齐国避难，齐桓公对重耳非常器重，认为必成霸业，将自己的女儿嫁与重耳为妻，又在博陵故址建台，供重耳时常登台西望，不忘故国，以图霸业。后人谓此台为“晋台”。据《博平县志》记载，“晋台”在旧治域中，但并没有具体地点，几经改朝换代，故城迁徙，原旧址早已荒凉无存，图存虚名。据旧志载，传说晋台草木丛

生，枝影皆向西，或在子夜时月西移而影不移，用以比喻晋公子重耳怀乡不忘，重整霸业的雄心壮志。虽晋台故址早已无存，而重耳之事世代相传，所以后人以“晋台晚照”为博平八景之一，无非是颂扬晋公子的复国霸业之志也。

(一) 李金枝

霸业已黄梁，古台峙博境。

至今月中树，向西不移影。

(二) 窦桂馥

日暮乡关恨未还，登台怅望转凄然。

齐桓老去葵邱后，秦穆伯来函谷边。

群从图功应计日，亡人归国有何年。

感他草木西枝影，晴月难移子夜天。

七、旭阳岳岚

泰山为五岳之首，它的雄壮伟姿，茂林胜景，自古以来是人们向往的胜地，或游览，或朝拜，留下了历代诗人甚至帝王的足迹和赞词。

“旭阳岳岚”意思是太阳初升之际，泰山在朝霞云海中的壮观景象。据《博平县志》记载，每到春秋晴空朝爽太阳初升之际，登城东楼（东城门楼），东望泰岳，碧峰插天，翠色如黛（青黑色），山间浮云流动，赤霞倒映，万山皆紫，变幻飘渺，甚是奇观，此景谓之“旭阳岳岚”。前人圣贤多有诗词以赞泰岳，以抒对祖国大好山川

的爱恋之情，现摘录如下：

(一) 杨祖宪

小城东峙有高楼，远影全从一览收。
最爱晴天朝空爽，遥瞻泰岳翠岚浮。
苍芒云拥群仙掌，飘渺霞明万佛头。
试上一层应更好，凌云烟点辨齐州。

(二) 窦桂馥

东楼晴空晓濛濛，争看赤霞射岱宗。
远岫遥飘云寸寸，茂林突出树重重。
天门下见长安陌，日观平临会稽峰。
甘雨有时遍四野，万山无处不云封。

(三) 李金枝

冲天凝紫气，影献碧霞宫。
散步城头上，万山一望中。

八、阜成暮雪

据《博平县志》记载，阜成台在县治后，高数仞（一仞七、八尺），明万历年间知县韩文建，台下曾立石碑，现无存。当时建这样一座土台的用意是什么，《志》中没有记载，可能是县官为了登台乘凉望景之故。后任知县王言又在台上建春晖楼，楼台一体，成为一景。旧县志对此景有一番描述：当在春晖楼上观望秋月，清凉的北风吹来，顿觉身在胜景之中；及至岁晚冬寒，回风舞雪，俯视村野里巷，玉界琼田，万

瓦一色，一片银白的仙境，望景生情，心旷神怡。

“阜成暮雪”以此得名，后人 有诗赞之。

(一) 李金枝

飞絮过女墙，漫漫隐北郭。

登高卜丰年，追随有白鹤。

(二) 杨祖宪

北窗清风夏日凉，南楼月色助秋光。

良辰到处心堪赏，瑞雪冬来舞欲狂。

缟袂有仙聊玉戏，琼花随意与风飏。

世间不少趋炎者，对此应教俗虑忘。

唐 槐

在平县杜郎口乡中学院内有一棵古槐。该校原为一座寺院，解放后改作学校，旧房逐渐拆净。据老年人讲，寺内原有大殿、二殿和东西廊房，当时碑刻如林，曾有人见过宋代欧阳修撰写的碑文，后均拆毁，不知去向，现仅存一高台。只有一棵古槐苍老而顽强地独立在高台上。

古槐树身周长4.66米、高5米，树冠高约4米，总高近10米。树身中间洞空，开空向西南，部分树干已枯死，唯有北面树干及向北一主枝还活着，枝繁叶茂。主权际西向留有一主枝锯疤。整棵树显得苍老挺拔，威武可观。

据当地人说，谁也不敢创这棵大槐树，认为这是一棵神树，创了会带来不幸。至今还有些带迷信脑瓜的人，逢年过节或遇有难事，常到大槐树前烧纸香、行跪拜，求大槐树保佑。也许这是古槐能保留至今的原因之一吧！

根据林业部门考证，此古槐为唐代槐树。

另外，在学校一墙基上发现一块记事碑，约半米见方，记录了山西当商为重修寺院而捐银两之事，是这座寺院的唯一文字证据。现抄录如

下：

山西太原府文水县平陶

都二甲当商吴振鲤男怀^仁义

重修大殿，并金妆释迦牟尼文佛、文殊
菩萨、普贤菩萨，施舍银两财物开后：

施银一百两

施麦斤斗三石五斗

施酒七十斤 皆

大清雍正三年二月二十八日立。

明 代 石 桥

在平县韩屯乡王桥村西南，有一座明代石桥，桥面为 20×5.5 米。南北向原为七孔，现剩五孔，横跨在东西流向的徒海河上。在石桥西面，每孔拱顶上都有一龙头，中间一龙头为开口状，左右两龙头为闭口状。石桥东面每孔拱顶上都有一龙尾，象征五条巨龙俯卧在徒骇河上。可惜，由于年久失修，龙头龙尾已遭毁坏。

整座桥均为石建，没有一块烧砖。结构为长条石大面向外平垒，从桥基算起每孔桥共用二十五行石砌成拱形，桥拱两头再用条石镶口，条石与条石之间用手指粗细的铁扒锯扣连，十分牢固。

据考古界考察，此石桥为明代万历年间所建（公元1573—1620年），距今已有370多年的历史。整座石桥横跨徒骇河上，略高出地面，虽经历年洪水冲刷，风雨残蚀，地壳震动，但整座桥仍十分牢固，整体没有多大变化，桥基深埋土中，桥拱无一坍塌现象。但由于年久失修，对古建筑保护不善，桥面已有些损坏，桥翅所剩石块已不多，从北数第二桥孔东头北面有一块石头已掉出三分之二，桥口的龙头龙尾均已残缺。

这座明代石桥，历经370多年仍十分牢固，这证明我们的祖先已掌握了很高的建桥技术，并具有较高的科学研究价值。

故 土 洪 洞 县

“问我家乡在何处，山西洪洞大槐树”是中原流传已久，范围较广的民歌。

通过地名普查和考证，在平县有六百多个村庄的居民始祖是从山西洪洞县迁来的。这就说明在金元之际，狼烟迭起，战火频传，中原各地长期遭受兵祸，居民中十有八九的死亡或流离失所。

据查，元帝国统治者入侵中原后，以极残暴的手段压迫人民，为了死中求生的刘福通率众起义。河南、两淮、山东从义之民在他的领导下，浴血奋战达十三年之久。苏、皖、予、鲁百姓已十亡七八。刘福通起义惨遭镇压，以失败告终，这是第一次兵灾。刘福通失败后，元朝诸王、将领各怀异志，内讧遂起。先后在乎、鲁一带及晋东、晋北、关中地区展开争城夺地恶战，以朱元璋出兵江淮而告结束，这是第二次兵灾。朱元璋出兵江淮，进取山东，收复河南，北定北京，战败王保保（扩廓铁木儿），灭李思齐于关中，据险设防，统一中国，这是第三次兵灾。

以上三次兵灾，历时十六年，在兵荒马乱之

中，军队无粮，杀老弱为食，百姓家破人亡，流离失所；饿殍遍野，白骨累累，赤地千里，不见人烟。加之黄河多次决口，百姓死亡难计其数。

山西，北起石岭关，南至黄河北岸的晋南地区。当时为元末名将察罕帖木儿及其子扩廓铁木儿（王保保）根据地。他们利用山西表里河山之险要，统治严厉，社会秩序稳定，山西之民死亡较少，因此得以生养繁殖。加之外地难民流入，形成人稠地狭之地区。这是明洪武年间山西移民中原各省的主要原因。

山西不但在元末大乱中少受兵灾，及至明惠帝朱允文即位，靖淮兵起，苏、鲁、皖、予广大地区的人民又遭受第四次兵灾。而唯山西一省未致战祸波及，这又造成明永乐年间，明朝政府为了均衡人口分布，发展农业生产，恢复中原经济，遂屡迁山西之民于苏、鲁、皖、予各省。

永乐皇帝定都北京以后，又将晋省居民迁于北京定居。经过几次移民活动，以洪洞县及其附近地区的居民为最多，所以洪洞县成了盛极一时的移民集散中心，明朝当局曾在洪洞县附近的广济寺设局驻员，负责迁民事务，发放凭照和川资。被迁民众出发前，皆汇集广济寺中的大槐树周围，倾诉离情祭奠故乡。他们将大槐树及树上的鸟窝入于眼，印于脑，指为告别家乡的纪念。

又将槐树种带到新迁之处种植，将迁民史传诸人后世，让后人了解大槐树与家族祖迹历史渊源。

古大槐树所在地广济寺，在洪洞县城附近，同浦铁路的一侧，寺院为汾河所毁，仅有金建石幢一座尚存，远望如塔，巍然屹立。古大槐树为汉代所植，树身数挽，浓荫可蔽数亩，因历年久远，早已老死。现存古槐据后人传说为原株北引，根上发芽长大的，亦已身根干枯，老态龙钟。但古槐根部又生新枝，绿叶点点洋溢着勃勃生机。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后集资，建亭立碑，题词：“古大槐树处”。碑阴刻有迁民记事。解放后，人民政府为了保留这一具有历史意义的古迹，特在此处开辟了“古槐公园”，公园门庭古朴，亭廓典雅，树木葱龙，风光秀丽，与苏三狱、永胜寺并为洪洞县久享胜名的游览胜地。

（原载《 荏博乡音 》）

在平的衙门朝正东

旧社会有句俗语，叫做“衙门口向南开，有理没钱别进来”，可是在平的衙门却是朝东开的。为什么？这里边有段传说故事。

在清朝康熙年间，江南有一位叫吴陈琰的举人，进京赶考路过在平时得了病，住在南关悦来店。在一天的夜间，有两个衙役来这个店里喝酒，一个衙役问：“哥们，你说是县大老爷好，还是咱们当衙役的好哇？”另一个衙役用手把嘴一摸美滋滋地说：“县太爷迎官接照，天天忙个不停。咱当衙役的下了班没别的事，高兴了喝二两，缺了钱敲上一竹杠，就够享用上几天的……”。这些话被吴陈琰听到了，心想我若当了在平县令，非把坏衙役狠治一下。他病好赶到北京，误了考期，带来的盘缠花光了，回家又没路费。只好在京城卖字为生，等待下次京考。有一天，翰林院把他叫去写字，正好这天康熙皇帝到翰林院叫翰林们作诗答对。康熙皇帝想用一首词总结清朝的过去，展望清朝的未来。他提出了上阕，让翰林们对答下阕。上阕是：半天霖雨点点滴滴化作长江巨浪愿东至广西至广南至广北至广愿天下至

应登秦岭越十二重峰观山观水观日月大清一统天下。众翰林听了个个目瞪口呆，谁也答不上。只有吴陈琰写出了下阕，请一位翰林呈交给康熙皇帝，下阕是：一介书生汲汲汲汲成拙拙文庸愿仕之魁乡之魁会之魁殿之魁愿天下之魁步金阶到十八学士安国兴邦安社稷熙朝万国恩良。皇帝看后十分赞赏，问是那位翰林写的，吴陈琰回答：“是小人写的，我不是翰林”。皇帝满意的笑着说：“按你的文才，也算是翰林，是我的门生”。于是吴陈琰就成了“天子门生”。

后来，康熙又指着一个篮子问众翰林：“你们说，东西南北都是方向，为什么篮子能盛东西，而不能盛南北呢？”众翰林又被问住，答不上来。吴陈琰回答说：“东西是金木，南北是水火，所以篮子能盛东西而不能盛南北”。康熙非常满意，从此以后，康熙皇帝有了难题都召吴陈琰商讨。

有一天，吴陈琰向康熙皇帝提出奏章，要求当在平县令，皇帝说：“在平县地处通南京的御路，每天都有官员过往，当个七品县令，光接送来往官员就够累的。”吴陈琰坚持要去，康熙皇帝说：“你既是我的门生，就不能迎送他们，我赐你半朝銮驾，把衙门朝东开，对着御路，过往官员文官下轿，武官下马，都要参拜你。”

吴陈琰谢了圣恩，来到在平改了衙门。把胡作非为的坏衙役重责革职，对县内大小官吏和三班六房的衙役进行了整顿，制定了法规，纠正了以往的坏衙风。

(原载《在博乡音》刊时有所增删)

茌平县村庄命名与通名用字浅释

马 传 文

考证村庄地名的由来沿革，是地名普查工作的任务之一；探讨地名用字规律，也是搞好地名工作的内容。全县一千多个村庄，各村名称多不相同，而立村的时代虽然多在明清，少数村庄远在汉朝，近在今天。但是多数是用不同的字样命一个有代表性的名称，作为村名出现于社会。现将本县1054个村庄的地名用字按照类别，作以浅释。

一、以姓氏命名的村庄769个，这类村庄多以“庄”为通名，冠以姓氏，中间含一“家”字，形成三个字的排列格式，后来为简便起见，简化为二字格式，如张家庄、王家庄、李家庄简化为张庄、王庄、李庄。据民国以前的县志·村屯记载：村庄名称普遍有“家”字，这大概是，在明初从山西或胶东迁来时，有的户迁居在原来的村址上、有的新开荒立家、当时尚未形成村落的原因，只按姓氏呼为张家、李家，随着人口增多，村落形成，逐渐演变为张家庄、李家庄。屡经沧桑巨变，发展到今天又出现了用方位词区别村名的重名，如东张庄、西张庄、南张庄、北张庄。

二、以人名命名的村庄有45个。这类村庄现在普遍不加通名，只呼其人为村名，如刘望山、刘海兄弟二人迁至茌平县分别立村，故名。也有的因后世村上出了名人，而以其人名代替村名的，如马明智庄原名马庄，清乾隆年间，因出了一个好善乐施、德高望重的名人马明智，村名就改为马明智了，这类村的特点是多以立村人或后世名人的名字而得村名，为了简便，只呼其名，不加通名。

三、以人工建筑物命名的村庄81个，因建筑物的名称不同，故村名的名称通名各异，其通名的含义又涉及到政治、军事、交通、文化和宗教风俗等方面。

(1) 军事方面的有屯、营、堡(铺)墩、台、寨、所等。古代的军事设施、通讯联络地点、屯兵要地因地名而保存下来。

地名中带有“营”字和“屯”字的，通常是军队驻扎而建营盘屯兵得名。本县带有“营”字的村庄17个，带屯字的村名有24个。如韩屯乡有三个带屯字的村，韩屯、鹅屯(罗屯)、郝屯。张营乡有八个“营”字村，张营、夏营、蛮营……。据《博平县志》记载和流传，后唐明宗还驾于此，驻军“三屯”“八营”，其还驾之地名命名“还驾店”。起驾之处命名为“起驾口”，(今在

高唐县境)。又如郝集乡双营村，传说为宋朝北征元帅程桂英率兵经此扎了两个大营，后人在扎营处立村名为“双营”。

其屯字的村，一是屯兵、二是迁民时建村屯居得名，如冯官屯、白官屯两个村分别由冯姓、白姓两名官员带领移民分别建村屯居得名。本县因此得名“屯”近20个，而因屯兵得名的却占少数。

堡（铺）和墩台，都属于军事名称，古代十里一堡，五里一墩，墩叫墩台，即烽火台，为卫、所屯集兵力，又负责通讯联络，观察瞭望，遇有战事，以烟火报警，顺序传递，调集兵力。居民点和自然地理实体带有墩、堡（铺）字的，通常冠以序数和方位，也是驿站所在地。驿站是古代传递文书和过往官员中途休息或换马处所，这类地名，大都在旧时州、府县城的通衢大道上，为政治军事要地。在平县城地处南京至北京、济南至聊城的要冲道口，所以城北有十里铺、二十里铺通高唐。城南有十里铺（堡）、二十里铺（堡）、三十里铺（堡）教场铺直通东阿。东有十里铺（堡）二十里铺（堡）通齐河。向西有十里铺通博平。这些铺中多数都有墩台，清末墩台遗址尚存。“堡”“铺”两字为通名，原写为“堡”后写为“铺”字。现在带有“铺”字的村

庄有7个，大都在交通要冲位置。

“寨”字为通名的村庄，多是设过军营建有寨墙而作防卫的大村镇，特别是解放前日、伪、顽横行时期，他们设了若干据点，修围子、建寨墙，招兵买马，成为区、乡公所驻地。本县带有“寨”字的村庄有8个，如贾寨、刘寨等，原考证立村后建过围寨得名。贾寨村明、清时期是否驻扎过军队无记载。但在1940年前后是伪顽汉奸盘踞的区公所驻地。而冯官屯村内有前寨、后寨两个村，据考证清末太平军北伐军李开芳率领八百余兵从高唐退至此地建修围寨抗拒清兵，后来清兵引河水灌入寨圩，故有“水淹冯官屯”之说。至今后寨的西北角残垣寨墙尚存。

带“所”字为通名的村，本县只有两个，即“吴家所”、“张会所”。考“所”字是隶属于“卫”的军事编制单位。

凡是设“卫”的地区，在一定范围内，必有若干所，此类地名在城乡都有。

(2)、与宗教有关的建筑物而为通名的村有寺、观、庙、堂、阁。全县共有56个带宗教建筑物为通名的村。

“寺”是佛教庙宇通称用字，如李家寺、季家寺、白虎寺等，在明清时代，以“寺”命名的村庄较多，现因寺院拆除而村名也改变了名字，

如贾寨乡的白虎寺，已改为卢吴庄，杨官屯乡驻地原名郑天寺，现仍叫杨官屯。

“观”是道教庙宇通用字，丁块乡延寿观村，建观年代很久，村以观名命村名，至今仍为村名，简称“观上”。

“庙”字作为通名的村较多，在迷信盛行的封建社会里，几乎村村有庙，最小的是土地庙，还有一个宗族修建的家祠，叫“家庙”。有的村以庙命名，如玉皇庙、十王庙、八仙庙、三官庙、郝家庙等。

有的村以庙的颜色取名，如红庙。有的村以姓氏加通名“庙”字为村名，如朱家庙、李家庙、大李庙、小李庙等。

“堂”为通名的村。堂原也是佛教庙宇的通用字，有的是女教徒所居住的地方称尼姑庵，庵堂并用。如本县的佛堂、乌家堂、李孝堂都曾有过尼姑庵。李孝堂村据传是以人命名。据考证：李孝堂遗址在村东南的大土堆上，清代以前有尼姑庵，俗称东庵，与在平城西尚庄遗址的红门寺遥相呼应。而“三教堂”则因庙堂内塑了儒教孔子，佛教（阐教）释迦牟尼，道教老子三尊神象，故名三教堂。

“阁”“皋”为通名的村。原来建有二层楼式的庙为“阁”。阁当地读做“皋”，所以误

读误写为皋。如王老乡的周家阁就用了“皋”字。在平县城北三里阁原来在村东建有“七圣堂”是阁楼结构，因村距县城三里故名。冯官屯镇韩家阁村，原建有药王庙而没楼阁，但也以阁字为通名。

因民族宗教而命名的村本县较少，在平南关在民国初建有礼拜寺，是回民居点的代表建筑物。

洪官屯乡回民李庄，清代称为李回回庄、回回李庄。

因村、集、市为通名的村。现在所建的新村多数是由原来的大村分迁出来的。如望鲁店新村，大吕新村，则是这种情况。凡是较大的村镇设过集市的有的由庄改名为集、市通名。如郝集、刘集、李家市等，都曾设过集市得名。

(3) 以水利设施为命名根据的通名用字有：桥、闸、堤、码头、口、沟、壕、井、湾、坑等，其中以桥字为村庄通名的较多，一般冠以姓氏加“家”带“桥”字，后来简化为姓加“桥”字为村名，如徒骇河上的甄家桥、邓家桥、陶桥、王家桥、许家桥、李家桥。在这不足十里的河道上就有7个“桥”字村，而陶桥村南建有大型栏河桥闸，而又以村名为桥闸名，名为陶桥闸。

郭堤口、摆渡口、杜郎口为河道渡口得名。

码头王，是因为处在古赵王河岸边设过码头而得名。

沟、壕名多以开挖输水道得名，如冯官屯镇刘壕庄因挖了一条大壕输送四新河水，因壕加姓得名。又如温陈乡大张庄、小张庄，原名张大沟庄，是因为村中有一条大沟得名。

以“井”命名的村很少，如肖家庄乡李井、赵官屯小井李等，因小井李村有一井，井口直径一尺左右，故名小井李庄。

(4) 以“楼”“坊”“仓”“店”“棚”“厅”为通名的用字较多，在交通方便、经济比较富庶的村庄，建立开设店房，建造手工作坊和富户名人盖了楼房就以此改为村名。丁块（当地人读“丁槐”）乡有六个村用“仓”冠以姓氏为村名。如贾仓、甄仓、刘仓、卢仓。据传赵王河上有一溜十八仓，因当地曾是水陆码头，以管仓人姓氏为村名。

带“店”字的村名多以设店为依据，如在平县城北二十里铺，又名逯店，因逯氏老人开了店房得名。

“楼”为通名的村共33个。王老乡的大王楼和小王楼两村南北相距十余里，因大王村比小王村大，楼也比小王楼的高，故命此名。韩集乡的季古棚村，因立村人盖了一个棚子暂时栖身，因

为房子比较奇特，故名季家古棚，村名沿用至今。

洪官屯乡“官厅”村，因靠小运河，清代在此建过专供管河人员居住和官员休息、议事的厅房，故以此命名。

四、以自然地理实体命名的村有70个。因本县地处冲积平原，村多以地形的高低或河渠命名，“海子”、“坑”、“湾”、“池”、“沙窝”、“垱堆”、“墩”、“块”（岗）、“岭”、“台”、“场”等。这类用字可分为两大类，一是以“水”得名，二是以“高地”得名。海子是地势低洼积水较多的地方。如菜屯镇马颊河上紧靠着就有南海子、北海子、西海子三个带海子的村。

全县有十多个洼、池、湾、村，属地势低洼之类。如金家洼、唐家洼、高双池、朱家湾、张家坑、于家河洼、于洼、洼李等。

凡属于高于平地的沙岭高地较多的地方多以岭、沙为通名，如张家沙窝、沙窝田、沙窝高、沙土张、五里墩、高家岭、台子高、垱堆赵等村，都是按本地特点，采用不同通名用字相区别。

还有的村靠近河渠，以此得名，如河崖李、河西宋、河西刘、河子张、史家河等。

还有的村以地貌命名，如韩集乡荒场村，因立村时当地是一片荒草野坡，因此得名。冯官屯

镇的大高村建于清代，明初迁民来时，在县城北十里立村，名为高家十里堡，以后迁至一片草荒野岭的马莲坡开荒种田建立村庄，即今大高村。菜屯镇林场村驻地是一片沙荒。自1958年大搞绿化、植树造林，迁来农户，在公社组织下，开辟了上千亩沙荒，林粮间作，现已发展到近百户人家，故仍以林场为村名。

还有的村以距县城距离、方位命名，除堡（铺）外，有三里庄、五里庄、南八里、北八里等。在平镇北原有五个三里庄，从西至东分别是何三里、逯三里、潘三里、崔三里、阁（皋）三里，一条大路横贯东西，村村相联。

有的村以村形村貌取名，如韩集乡的后吴庄，原名辘轳窝（音吊），即因其形像汲水的辘轳一样。

张家胡同村，原名大潘庄，因张氏迁来时住在一个胡同里，以后潘姓人绝，张家又出了官员，故村名改为张家胡同。农村以胡同作村名的不多，一般是城镇街道的专用通名。

五、以名胜古迹、古城址、古遗址命名的村共20多个，其通名用字各异。一般用“城”字，如郝集乡土城村，是北魏时期在平县第二座县城驻地，曾有四个名字，即：土城、阳城、布谷城、鼓城。在平县秦、汉时代的县城址，古名曾

叫济州城、碯礲城，而后人在原城址的残墙上建村，故改名高垣墙。洪屯乡郭摄庄原名郭庄，是春秋战国时期摄城遗址，由于年代久远，后人在此立村为郭庄。台子高村南的高台子是春秋时的社邱遗址，明代高氏在高台子北立村取名台子高，其遗址名为台子高遗址，列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六、以物产命名的村有36个，多以“园”字为通名，如博平镇的王菜园、花园、枣刘庄（原名十里枣园），枣刘庄的枣在明清时期是向朝廷进贡的物品。

乐平镇的梨园村，因产梨出名故名。

还有的以手工业产品得名。如乐平镇的簸箕赵，因赵氏以种绵柳编簸箕、卜箩是祖辈传统的手工业，故名簸箕赵。温陈乡铜器赵庄，因赵姓开铜器铺得名。郝集乡的菠菜胡村，以种菠菜得名。胡屯乡驻地胡屯村，原名瓠（音互）子屯，因当地群众有种瓠子瓜的习惯，从春到秋瓠子满市，后演变为胡子屯，1946年以后简称为胡屯。

七、以吉祥嘉言命名的村有2个，郝集乡的万福庄，万氏立村为万庄，为区别温陈乡万庄，故加“福”字相区别。丁块乡的傅家楼与温陈乡的傅家楼重名故将丁块乡傅家楼改为傅兴楼。

八、因逸闻奇事命名的村有31个，没有一个

标准通名，如肖家庄乡王菜瓜村建在博平旧县城附近，后因王环老人用菜瓜打金牛的传说命村名为王菜瓜。

杜郎口乡刘神仙庄，简名刘神仙，刘神，因刘氏兄弟从山西迁来，传说刘家老二为群众治病手到病除，其效如神，死后变成石神故名。

广平乡大磨刘、胡屯乡大磨王、韩屯乡大碾李，传说大磨、大碾有的是大风刮来的，有的是大水冲来的，并且各有神话传说。虽然至今磨碾尚存，但谁也说不清它的来由历史。

（原载一九八八年《山东地名通讯》第十三期，这次刊用稍有改动）

在平县董庄民间中堂画

路振华、孙立杰

在平县杜郎口乡董庄，位于在平县城东南20余里，是方圆几十里的民间中堂画产地的中心。该村现有65户人家，每年冬季从事绘画者约100余人，有数万套中堂画销往本省各地及河北、河南、山西、安徽等省。在北方民间有着较大的影响。

约在明隆庆五年（1571年），河北省清河县人董月，迁移到在平城东南董庄落户。到其第六代人董继白（字松云，约1725—1796）的花鸟画就有了一定的水平。他所绘制的“条屏牡丹”，从章法布局，勾线赋彩，到题字印章，都非常讲究，为后人世代珍藏，“文化大革命”中，毁于一旦。据董家后裔回忆，绘画似不从董继白开始，还可能更早。由于年代久远，究竟始于何时何人，目前尚难论定。到了第七代的董玉池（系董继白之子，1761—1836）时，绘画水平已到了较为成熟的阶段，尤工鞍马、山水、人物。他排行属四，因上有几个兄长从事耕作，乃得以充裕的时间从事绘画。董玉池享年75岁，故留下的作品很多。现存的《八骏图》，是他的手笔。展卷

望去，典雅之风扑面而来。该画章法严谨，笔墨活泼。马匹有立有卧、神态各异，造型准确生动，设色沉着谐调。《九羊图》是他的另一幅代表作品，系用墨色绘成，效果与《八骏图》相当。据说他的山水画也有一定的功夫，气韵笔墨俱佳，为世人所称道。因此，向他求画者不绝。

有前几代人取得的成就，到第八代董立元（1790—1840），字逢春，号云槎，系继白之孙玉池之侄。他在世虽50余年，却留下了许多优秀作品和画像。这和他的经历与发愤努力是分不开的。据说他成年丧父，因无力办丧礼，又遇外公赵家鄙视而出走。由此，倍加努力，以告慰先灵。他先到山西太原，以其传神写像之技，赢得当地名流赏识，遂得资助，方回乡为父出丧。后到曲阜遇衍圣公孔庆镕垂青，得奎文阁典籍之职，又经孔氏荐举赴京考取内阁供事，调任直隶属理按察司，保定府束鹿县县丞，后升任正定府深泽县知县，因母去世回乡。由于他的绘画成就，故被道光皇帝授于“文林郎”的称号。由于他基础好，社交又广，经常与名家臣卿交往，因而他的艺术修养及绘画水平，都大大超过了他的前人。董立元从前辈那里学到了花鸟、山水和传统技法，又攻研人物，所画人像无不毕肖。每到一处总有人高价求他画像。

董立元的人物画创作，是他作品的重要组成部分。其选材大多为神话故事、名媛淑女。现存《三仙炼丹》、《麻姑献寿》是他的代表作品。两幅均为半工半写人物画，所画线条生动流畅，人物准确生动，尤以面部处理最为精致，两画中的仙女着墨用色不多，但文静善良的性格跃然纸上。另一幅《中八仙》系大画中堂，也堪称佳作。时人把他与当时的著名书法家崔班，画虎高手杨频并列，有“崔字杨虎董人物”之称。

董立元的影响，带来了在他以后一百年间的最繁荣时期。这中间三代人，几乎都善书能画，作品也多得难以统计。由于卖画盛行，流入各地被广泛收藏。继起的是董氏第九代董芝兰（1800—1860），也善画人物山鸟。现存《花鸟条屏》为其代表作品。四幅中以《荷花鸳鸯》、《九鹤图》两幅为最好，从构图、笔墨、设色来看，技法可称纯熟。他也曾在孔府任画师多年，后因年老眼花由后人接任。

第九代董长庆（1836—1906）系董立元的侄子。他擅长人物画，现有《带子上朝》、《大天官》等。《带子上朝》据说取材于唐郭之仪带其子郭暖上殿请罪一节。画中表现的人物雄壮、富丽。衣纹为中锋长线，运笔准确而有力。服饰图案尤其画得完美。

第十代董学善（1870—1940）是山水画高手，现存《渔樵问答》出自他手。画的中上部树木群山，系以墨色绘制而成，颇有韵味，下部两个人物情节、神气处理恰当。董学诚（1871—1951），善画写意人物画，有《人物四条屏》之三幅存世。画中人物李白、苏武、铁拐李均用大笔绘成。无论墨韵和气势都值得称道。论气势，董学诚似在他的前辈以上。其二弟董学敏（1874—1955），善花鸟虫鱼，现有《横幅牡丹》藏之，设色鲜明艳丽，墨线纯熟。

第十一代董兴金（1848—1923），曾在孔府任奎文阁典籍30余年。以绘制人像、历代帝王像为主要工作。据说他还长于花鸟画，所画蝴蝶，以淡墨层层烘染，翅膀毛茸茸的活灵活现。他的作品大部散失。现存《仕女蝴蝶》，很可能是作品的临本，但也可窥见他风格的一斑。

在董玉池和董立元时期，作品多用玉版夹宣，都是卖给官家豪门的，要求较高，制作时间长。以后，从事绘画的人多了，为了争销路，就转向了民间，制作时间也相应地缩短了。他们有的在耕作之余动笔作画，有的雇用别人耕种，自己专门画画。这样每年冬秋两季外出卖画，经济收入大大增加了。董庄就此富裕起来。以董学诚一家为例，他和学敏、学慎兄弟三人画画，每年秋

天种完小麦后出发，到麦收前回来，据说最多的一次竟带走了2000多套画，赚回了近500块现大洋。这在当时是相当惊人的。因此，他家田地从20亩靠卖画发展到了160多亩。解放初期，有一次董学明到南宫去卖画发了财，回来后到附近集市上去买粮，粮市几乎被他一人所收。外村人说：“董庄真是俩秋俩麦呀”。

为了争取画得更快更多，开始选用吸水性小的版纸和粉连纸制作。这样便促使董庄绘画产生了明显的变化。人物画越来越少，花鸟画渐渐增多，用色趋于明显艳丽，勾线处于从属地位。这可从董学敏的花鸟画和董兴业的人物画上看出端倪。这些变化为下一代的根本变革提供了基础。

第十二代董友谅，字总卿（1892—1972）。他是完成这种题材、表现手法到工具材料改革的主要人物。董友谅在世80多年，经历了清末、民国和新中国三个历史时期。他年轻的时候，从上辈人那里学到了工笔、写意的传统技法，无论人物、山水、花鸟都有较深的功夫。《八仙》、《和合二仙》、《刘海戏金蟾》是他常用的人物画题材。花鸟题材则以牡丹为主。现存的《中堂牡丹》是他早期的作品。从其严谨的画风中，犹可见到与其前代的一脉相传。《松鹤图》则是他晚年的代表作品，系用深、浅两种墨色在白版纸

上完成。鹤顶、尾部及其月亮的设色，基本上用纯色涂抹，较少变化。这种方法易于学习掌握，成为解放初期董庄民间中堂画的代表风格。这种风格的盛行，又导致以后30年来的色彩化时期的到来。

解放以后的三十年中，董庄中堂画有两大变化，一是销售季节方面，变两年一季为一年一季，即腊月的旺季。这主要是为了迎合农民每年需要换一次中堂的习惯。二是艺术表现方面，变双勾为没骨，变淡彩为重彩。另外，这一时期在题材上倾向以花鸟为主，构图罗列饱满，色彩更加单纯鲜艳，勾线变得可有可无。这时期代表人物很多，而且各具特色。董长舜（1906年生）系董立元曾孙，常画牡丹、鸚鵡，勾线以轮廓为主，填色或绿或红较为单纯。董友信（1934年生）、董友庆（1925年生）、董兆和（1936年生）、董兆兰（1933年生）等都擅长花鸟画，尤以凤凰牡丹表现为多。花瓣与凤凰羽毛多用大笔或刷子蘸洋红（染土布颜料）表现。画竹，也多以纯绿色来表现枝干和叶子，用色概括。效果对比强烈。董友功（1935年生）、董兆生（1941年生）常画喜鹊梅花、牡丹凤凰，需用笔工细的局部常用木版刻印线稿，印于画纸，然后填补颜色。这样既提高了速度，又不致走了大样。董友

功和董兆生的凤凰，尾部处理最具趣味，常以排刷蘸各种颜色，顺势画出，效果别具一格。他们又以书写快速著称，每日能写70至100幅中堂字。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董庄绘画这朵民间艺术之花迎来了春天。绘画活动又活跃起来了。从1980年起，县文化馆美术组、乡文化站多次深入董庄走访老艺人，举行座谈会，并搜集藏画作品。1982年乘聊城地区农村文化中心工作现场会在茌平召开之际，文化馆举办了《茌平民间美术展览》，展出董庄中堂画70余幅，受到领导与观众的好评。很多人对展览中董立元等名手的作品叫好。有的在留言中写道：“茌山奇葩竞新颜，乡土丹青新百年，喜逢盛世春意闹，早下洛阳比牡丹”。之后，地委、地区文化局、地区文联等领导同志，又到董庄参观指导。省美术馆、省美协负责同志也先后到董庄访问，并题词勉励：“发展民间艺术，提倡精神文明”。《文汇报》、《大众日报》、山东广播电台、山东电视台，都曾报道介绍了董庄的绘画活动，引起了各界的注目，也激发了董庄人的创作热情。1983年初，省文化厅指示茌平县文化馆编写了题为“开展民间美术活动，丰富农村文化生活”的汇报材料，由山东省美术创作部主任朱学达同志，带到

中央文化部在陕西省户县召开的“全国农村美术工作座谈会”上去。为使董庄绘画在新的历史时期产生新的作品，发挥应有的作用，1983年秋，县文化馆、乡文化站曾在董庄举办了第一次农民画创作学习班，由孙立杰同志具体辅导。参加这次学习班的学员共14名，创作出各种形式的新作30余幅。其中有6件作品参加了同年10月举行的“山东省第二届农民画展”，计有《洗牛》（崔正连、董庆忠作）、《砸棒子》（董兆泉，董桂连作）、《扒黄苘》（赵日利作）、《责任制好》（董庆忠、董爱臣作）、《喂鸡》（张加旺、胡梅秀作）、《晒棉》（王瑞国、赵日利作）。其中《洗牛》一幅还由《大众日报》刊登。同年10月，在“聊城地区美术作品展”中，也有董庄学习班的作品7件入选。1984年，第二次学习班创作了农民画10余件，被地区国庆美展选中5件。1987年4月，由中国美术家协会组织筹集、深圳大学《世界建筑导报》社举办的“中国民间艺术品展览”，选入了董庄农民画作品两副，赴香港展出并获得好评。这两件作品是《喂鸡》（张加旺、胡梅秀作）、《交棉去》（董庆忠、胡传申作）。

附：董庄绘画主要艺术传人年表；

董庄绘画各代传人现存作品表。

董庄绘画主要艺术传人年表

始祖：董月，明隆庆五年（1571年），从河北省广平府清河县，迁往山东省茌平县董庄。

六世孙：董继白（1725—1796），董氏绘画开始。

七世孙：董玉池（1761—1836），系继白四子。

七世孙：董玉义（1764—1815），继白五子。敕封文林郎。

八世孙：董立元（1790—1840）系玉义长子敕授文林郎，官河北正定府深县知县，孔府奎文阁典籍。

九世孙：董芝兰（1780—1860），孔府画师。

九世孙：董长庆（1836—1906）。

十世孙：董学善（1870—1940）。

十世孙：董学诚（1871—1951）。

十世孙：董学敏（1874—1955）。

十世孙：董学慎（1888—1960）。

十一世孙：董兴金（1848—1923），任孔府画师、奎文阁典籍。

十一世孙：董兴业（1877—1951）。

十一世孙：董兴舜，1906年出生，系立元曾孙。

十二世孙：董友谅（1892—1972）。

十二世孙：董友功，1935年生。

十二世孙：董友信，1934年生。

- 十三世孙：董兆和，1936年生。
 十三世孙：董兆兰，1933年生。
 十三世孙：董兆生，1941年生。
 十三世孙：董兆明，1961年生。
 十三世孙：董兆泉，1963年生。
 十三世孙：董桂莲（女），1963年生。
 十三世孙：董兰芳（女），1966年生。
 十四世孙：董庆忠，1964年生。
 十五世孙：董传生，1964年生。
 十五世孙：董庆江，1965年生。
 十六世孙：董维祥，1949年生。
 十九世孙：董欣国，1967年生。

董庄绘画各代表传人现存作品

序号	题目	作者	收藏者	完好度
1、	八骏图	董玉池	董兆和	良好
2、	九羊图	董玉池	董兆和	良好
3、	三仙炼丹	董立元	董兴舜	良好
4、	麻仙姑	董立元	董兴舜	良好
5、	八仙	董立元	刘延轩	良好
6、	花鸟条屏	董芝兰	董兆和	良好
7、	带子上朝	董长庆	刘延轩	良好
8、	天官	董长庆	刘延轩	良好
9、	人物条屏	董学诚	胡庆堂	好
10、	渔樵问答	董学善	张宗元	良好

11	双鹿	董学曾	董兆生	好
12、	横幅牡丹	董学敏	张宗元	良好
13、	苏武牧羊	董芝兰	张宗元	好
14、	山水条屏	董芝兰	董兆和	好
15、	鱼	董学道	董兆生	良好
16、	十八罗汉		董兆生	良好
17、	斗鸡		董兆生	良好
18、	小叭狗		董庆川	良好
19、	人物蝴蝶	董兴金	董兆生	好
20、	花鸟条屏	董芝兰	董友功	好
21、	白猿献桃	董兴业	董兆和	良好
22、	禹王锁蛟	董兴业	董兆和	良好
23、	大乔二乔	董兴业	董兆和	良好
24、	家堂轴子	董兴业	董兴全	良好
25、	团扇仕女	董兴业	董兆生	好
26、	中堂牡丹	董友谅	董兆和	良好
27、	仙鹤	董友谅	董兆和	良好
28、	山水	董长庆	董友信	良好
29、	花鸟	董立元	刘延轩	良好
30、	鹰		董兆灿	良好
31、	福祿寿三星	董学慎	张宗元	良好

注：以上所列均属收藏佳作，另有稍残书画约100余幅，均散藏于董庄及附近各村。

（原载《文化艺术志资料汇编》）

茌平县政协文史资料征集提纲

人民政协文史资料工作，是周恩来总理于1959年倡导的。它是人民政协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是爱国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社会主义文明建设的有机组成部分。当前，我国正处在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做好这一工作对保存祖国历史资料、继承和发扬民族精神，振兴中华，促进祖国大团结、大统一，教育人民群众和青少年，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因而，我们遵循“高举爱国主义旗帜，坚持实事求是原则”的工作方针，积极搞好我县文史资料的征集、编纂、出版工作，对丰富和保存本县的珍贵史料，服务地方，受益当代，惠及后世，其重要意义不可低估。

我们曾在《茌平文史资料》第一辑中刊载过一个“文史资料提纲”，现在根据1989年8月全国政协北戴河文史工作会议精神要求，重新研究，重点补充了建国后的征集内容，经过广泛征求意见，又制订了这个征集提纲。

热诚欢迎大家参照提纲，本着“忠于历史，秉笔直书，不为亲者讳、长者讳，不溢美、不贬损”的原则要求，可以不拘体裁、不拘长短、不拘言辞，将自己亲历、亲见、亲闻有意义的史事和人物等方面的资料，撰写成稿，或口授笔录，惠寄我们，不胜感谢。

在平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

一九九一年三月

一、政治、军事方面

- 1、戊戌变法以来的历届县长、县丞；
- 2、鸦片战争对在平的影响；
- 3、帝国主义贩卖鸦片对在平人民的毒害；
- 4、红灯照、朱红灯在我县的活动；
- 5、有关红枪会、大刀会在在平活动的资料；
- 6、共产党早期在在平、博平的组织发展和活动；
- 7、国民党早期在在平、博平的组织发展和活动；
- 8、日本侵略军侵占在平、博平的资料；
- 9、抗日时期在平的抗日、国民党、敌伪政权方面的资料；
- 10、在、博各党派团体和各界人士积极开展救亡活动，踊跃参军、参战方面的资料；

11. 梁漱溟在茌平的“乡村建设”；
12. 杨勇、肖华支队在我县的活动；
13. 有关老二团的资料；
14. 齐子修军队的编制及在我县的活动；
15. 李歧山反动军队的发展和编制及其在茌平的罪行；
16. 罗兆荣反动军队的发展和编制及其在博平的罪行；
17. 李歧山血洗南张楼的罪行；
18. 日伪军在茌平、博平实行“三光政策”的罪行；
19. “六、二七”惨案的资料；
20. 日本在茌、博抓华工及华工的遭遇经过；
21. 八路军和茌、博县委领导抗日武装反扫荡的资料；
22. 茌、博县委领导下的县大队和各区中队的成立、发展、壮大及其与日、伪、顽英勇战斗的资料；
23. 抗日敌工队、武工队对敌斗争的种种活动；抗日自卫团、农救会、青抗先、妇救会、儿童团与日、伪英勇斗争的资料；
24. 抗日革命先烈对敌斗争英勇不屈的资料
25. 南张楼英雄村对敌斗争可歌可泣的英雄

事迹；

26. 我党我军及地方政府的地下联络站（点）的抗日活动方面的资料；

27. 团结开明士绅进行抗日活动的资料；

28. 日伪操纵建立的维持会、新民会及其活动的资料；

29. 解放在平、博平的资料；

30. 解放后开展“减租减息”、“反奸诉苦”的有关资料；

31. 在平、博平开展“土地改革”运动和“土改复查”的有关资料；

32. 1947年大参军的资料；

33. 在平、博平人民群众支前模范事迹的资料；

34. 建国初期政权建设的资料；

35. 农村政权建设及其作用的资料；

36. 统战工作的有关资料；工商联的建立和
活动；

37. 各届人民代表大会的资料；

38. 工会、妇女、青年团组织建设及其组织作用的资料；

39. 抗美援朝捐献飞机、大炮的有关资料；

40. 在、博籍赴朝志愿军指战员在朝鲜战场上浴血奋战的有关资料；

41. 1950年在任、博青年学生参军参干的资料;
42. 开展“三反”、“五反”运动的资料;
43. 解放后“镇反”、“肃反”运动的资料;
44. 1953年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有关资料;
45. 取缔会道门的资料;
46. 1956年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资料;
47. 开展农业合作化运动的资料;
48. 粮食统购统销的资料;
49. 1957年开展整风、“反右”的资料;
50. 破获“反共和平军”反革命武装暴乱组织的全过程;
51. 开展“整风补课”、“反右倾”的资料;
52. 1958年人民公社大炼钢铁、大跃进的资料;
53. 58年大放“高产卫星”的资料;
54. 1960年彻底纠正“五风”的资料;
55. 民兵组织建设与治安管理的有关资料;
55. 民政工作史事方面的资料;
57. 拥军优属、拥政爱民方面的资料;
58. 开展学雷锋活动的资料;

59. 开展社会主义教育（四清）运动的有关资料。

60. “文革”初期“红卫兵”、“破四旧”的有关资料；

61. “批林批孔”“清查5·16”等运动的有关资料；

62.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有关资料；

63.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落实干部政策，平反纠正冤假错案的资料。

二、工商经济方面

1. 清末田赋制度的资料；

2. 辛亥革命至解放前在平的农业状况；

3. 解放前后商业情况的资料；

4. 解放前后手工业情况的资料；

5. 解放前地主盘剥农民的形式；

6. 解放前农村的长工、短工、土地买卖和租赁；

7. 冯官屯“六娃娃”及其当铺；

8. 解放前钱庄、当铺方面的资料；

9. 城乡集市、庙会等市场贸易方面的资料；

10. 解放前后民间作坊（手工纺织、印染、酿造、糕点、制粉、油房、鞭炮等制造）方面的资料；

11. 在、博民间旅店、名吃馆方面的资料；
12. 在平古驿道的形成和发展的资料；
13. 在梨博枣的资料；
14. 供销社、搬运社、手工业社、农业互助组、合作社、人民公社等方面的资料；
15. 在平水利及对农业的影响；
16. 在平资源方面的有关资料；
17. 在平对外贸易方面的资料；
18. 在平工业、商业部门的建制、沿革及其管理；
19. 在平财政、税务、物价管理及市场贸易；
20. 在平县的机械、铸造、冶炼等工业的有关资料；
21. 在平县的化工、炸药等生产发展，应用的资料；
22. 在平服装制作部门的建立和生产发展方面的资料；
23. 在平工、商、财、贸、粮、油各系统、各单位经历（发生）的较（重）大事故的有关资料；
24. 在平县的化肥、造纸、毛巾、纺织等生产的资料；
25. 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的资料；

26. 农业机械化、水利化、电气化建设方面的资料；

27. 在平县农业、林果业、畜牧业、副业、渔业的经济发展和管理方面的资料；

28. 在平县粮油、物资、燃料管理方面的资料；

29. 在平县银行、邮电、交通运输方面的建制、发展，变迁方面的资料；

30. 坚持改革开放、发展经济的先进典型；

31. 在平县乡镇企业的兴起、发展、管理等方面的资料；

32. 港、澳、台和海外同胞发展经济的先进技术和经济方面的资料。

三、文教、科技、体育、卫生方面

1. 清代在平的科举人士；

2. 清末在平的教育事业；

3. 解放前的十三联中、简师、四县联中（赵老石）等学校的资料；

4. 在平一、二、三中，城关镇中学、县师范、职工中专、技校、卫校的建立与发展；

5. 在平的幼托教育事业；

6. 解放前在平的文化娱乐；

7. 解放后在平县的扫盲运动、农民识字班、夜校、职工教育的资料；

8. 1958年的在平县报；
9. 在平县的京剧团、文化馆、图书馆、新华书店、电影院、电影队、广播站、电视台；
10. 在平县的科技发展和科技人才及科技如何为经济建设服务方面的资料；
11. 在工、农、渔等生产科技方面的创新、发明，较大贡献人士的资料；
12. 工、农业等科技成果的资料；
13. 在平气象建设和服务方面的资料；
19. 在平县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的成立、人士变迁、职能措施方面的资料；
20. 在平县药材公司的建立、发展和业务开展方面的资料；
21. 在平县的文化古迹和出土文物；
22. 在平县的名胜古迹；
23. 在平县的著名石刻、碑文、古建筑；
24. 在平的民间中堂画，剪纸方面的资料；
25. 董立元其人及画；
26. 解放前后的民间鼓乐班；
27. 在平的教育家、音乐家、医学专家等；
28. 在文化教育、科技、体育、卫生方面建国以来出席省以上的英、模代表、体育健儿等人物，；
29. 占卜、相面、算命、巫医、神婆方面的

资料；

30. 在平的说唱艺人；

31. 在、博民俗、风物等方面的资料。

四、民族、宗教、“三胞”方面

1. 在平的少数民族；

2. 少数民族在我县的风俗；

3. 在平的宗教；

4. 回民与伊斯兰教；

5. 解放前的寺庙、祠堂、教堂；

6. 解放前的和尚、道士、尼姑等；

7. 在平宗教的发展与活动；

8. 宗教“三自”爱国运动的资料；

9. “三胞”爱国、爱乡事迹；

10. 在、博籍台胞在台湾的政治、经济、文化状况及其职业生涯等方面的资料；

11. 在平支边、援外方面的资料；

12. 在平籍人士在民族、宗教等方面做出贡献的资料；

13. 民间各族人民的族（家族）教、法情况及各自在民间所产生的影响；

14. 在平在外华侨分布情况及其创业经历。

五、社会沿革与社会拾遗方面

1. 在平、博平的历史沿革；

2. 在平、博平考略；

3. 在平县城的变迁;
4. 在平名称的由来;
5. 关于在平山;
6. 在平村名的由来、特点、故事传说等;
7. 群众服饰, 发式、足式的变迁;
8. 在平的传统节日;
9. 在平的婚丧嫁娶;
10. 在平民间的称呼和礼节;
11. 在平境内各地风土人情、语言特色等。

六、在平的名人名士史料

1. 革命人士: 解方、徐宝珊、徐宝璧、谢洪光、张化夷、贾靖五、刘振岐、张金屏、谢鑫鹤、郭庆江、袁寿宸、吴亚屋、李玉、贾振铎、李健民、杨钦、李希禹、刘元仲、宋瑞章、董传章、韩严明; 刘影。

2. 文教卫生方面: 崔蜀才、于树三、仝伯厘、黄步青、张建绍、董泽民、高振年、张士雪

3. 文化体育方面: 杨少彝、董立元、李半仙、张大辫子、张树楼。

4. 敌特人员: 张洪猷、刘文震、戚镇三、李曰山、李岐山、罗兆荣、张庆林、薛希祥、王子范、吴春阳、云茂才、齐子修。

5. 历史人物: 石勒、马周、王曰高、李少圃、马定国、鲁仲连、耿端义、淳于髡、赵

维新、韩国玺、张宏山、成无己。

14. 历史上农作物遭受风、雹、旱、涝、虫、蝗、病等灾害的资料；

15. 在平县的体育、武术活动的资料；

16. 解放前在、博私人诊所和名望医生，祖传秘方；

17. 解放后的卫生、保健、防疫方面的资料；

18. 在平县的一、二医院、中医院、区、社（乡）医院的建立、发展，医疗贡献方面的资料；

后 记

第二辑《茌平文史资料》，已编印成书与大家见面了。在编辑工作当中，得到了各级领导和有关部门的大力协助和支持，山东省考古研究所，山东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的文物照片，茌平县文化局副局长孙恒生、图书馆马允华、地名办马传文等同志为我们提供了大量的资料，使我们顺利地完成了本书的编辑出版工作。对此，我们表示衷心的感谢。由于我们工作人员的水平所限，错误之处在所难免，欢迎广大读者和各界人士，给予批评指正。

编者

1991·5

[G e n e r a l I n f o r m a t i o n]

书名 = 荏平文史资料 . . 第二辑

作者 =

页数 = 1 6 9

S S 号 = 0

出版日期 =

封面
书名
前言
目录
正文